

1945.

海內

畫

桑榆

舊





上海內幕目錄

前言

一、「交還租界」

五——一

欣逢其會……改了樣的「上海市長」

……警察機構……「大上市長」

北火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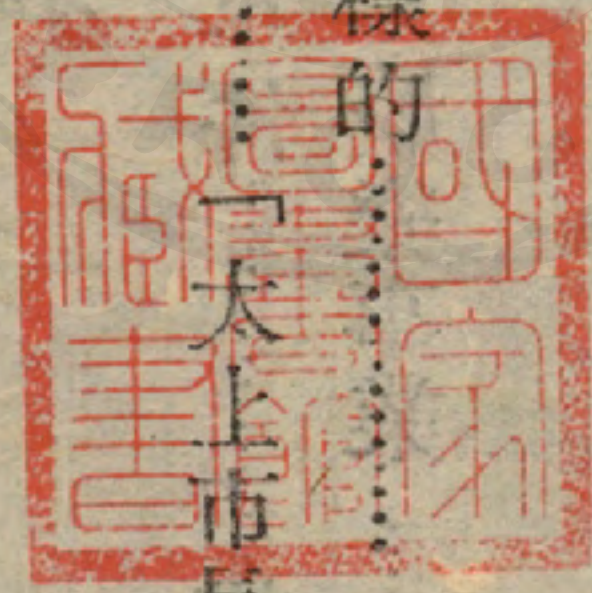
二、所謂「新政策」

一二——一九

什麼是「新政策」……武者小路實篤的話……

上海內幕輯次

一



吉田東祐的「名作」……………兩次有趣的質問……………
……………不打自招野心畢露

三、上海的經濟縮影

二〇—三四

紗布事變……………股票事件……………謀生之道……………

……………「走盟幫」……………娛樂事業……………什麼是

財富？

四、一般的心理

三五—四五

第一個意料之外……………第二個意料之外……………

矛盾的心理……………「重慶氣味」……………發現了

一個奇蹟……………第二個奇蹟

五、敵僞之間

四六一—五三

第二種親日派……「申報」對抗「中華日報」

……后大椿案……日憲兵被殲……李

……逆士羣死因……果然畢命的汪逆

六、魔影幢幢

五四—六四

共舞台事件……上海的警察……吳淞的查

緝處……同化了的日人……「六大茶室」

……「青少年運動」

七、我的被「傳」

六五—八〇



八、上海的衣食住行

八三—九四

衣……食……住……行……享受

?……虹口

九、斷鴻零簡

九五—一〇三

藝文壇……體育界……聞人之流

違心之談……小故事

後跋

一〇四—一〇七

五

四

前言

「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甲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

——程頤，見宋史傳。

我是在前年（三十二年）初夏，動身到淪陷區去的，取道浙東，七月十五日踏進偽和平軍區；去年（三十三年）五月一日離開。所以，實際上，我在偽區內的時間僅十個半月；但是本書所牽涉到的，也許在有些地方不得不追溯些略早一些的時間，或者在寫初稿時得到一些較晚的材料，所以，姑且叫做「一年」。同時我感覺到，欣逢其會——敵人所盛稱的「新政策」正在實施（？），洋場十里的上海正轉變到漆黑一團——便有許多話想對我們後方的同胞們談談。何況，上海，無論如何，究竟是偽方的經濟中心，是敵人在華作戰的後方根據地，是「新政策」實施的觀瞻所在地。它所表演的一切相當的修顯示出敵偽醜態的輪廓。而我，在這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時間的滯流連在上海，耳聞目見所及，信筆報道，直覺論述，雖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我是盡我所知的，毫無掩飾的。

「上海究竟怎樣？」「鄉下呢？」這一類的問題，在我碰到任何一個友人時，就拋到我身上來。」

敵人的態度怎樣？」「在上海看來，（就是在敵人的宣傳勢力圈內）戰事的前途如何？」這一類的問句又在握手言歡後所必然的談助，這本小書也許可替我省却許多唇舌。

在非常的時期，什麼事就變化得非常快；譬如，有人要提出一種質問：上海的生活究竟怎樣？老百姓的日子好過麼？倘若我僅僅回答：「很壞」，或是「難得過去」，人家未必相信；倘若我換一種方式回答：「上海的米價現在是五千元一石，鄉下稍為便宜些」，却也未必能滿足質問者的初衷，因為米價僅是生活費用的主要原素之一而已，何況「上海人的進益又怎樣呢」一定又問過來；所以，這些事既不能一語破的，也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一切，這本小書大概能幫助一些。

然而衣食住行的化費價格，相對的，是生活費用的標準之一，我不能一一舉例，且把我自身所時常感受到的，回憶力所能及的，擇要臚列於后，且讓讀者有了一些印象，然後再讀下文，輪廓自見：

三十二年八月一日 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白飯（每碗）	三元	七元
大米（每石）	二千元	五千元（最近屯溪電訊已達七萬元）
普通襯衫（每件）	一百五十元	五百元
上等旅館房金	二百五十元	六百元
黃包車起碼車力	五元	十五元
三輪車（單座）	十五元	三十五元
大前門香烟（每十支限價）	三元	三十六元（限價已取消，黑市價）

小型報（每張）

二元

十元

白報紙（每令）

一千五百元

五千元

擦皮鞋（每雙）

三元

十五元

報紙不能以「申報」「新聞報」等爲例，因爲這些報館的白報紙是由敵大使館配給的，其價格雖略有增加，但爲數甚微，不能視作一般物價增加的比率；小型報，其實是小報，刊載些純粹風花雪月的消閑文字，大都是商業型的產品，比較的可代表讀物的價格。

三輪車是戰後的上海新產生的代步車輛，其普遍性實較黃包車爲廣，有單座雙座兩種。那是：前半段一部自由車，後半段一部黃包車或馬車的後半部（指雙座的）型的東西；速度自較人力車爲快。可沿途叫坐，可電話接送。雙座的價格是從三十元，漲到五十元。至於木炭汽車也有出差的，三十二年七月是五十五元，三十三年四月是二百二十元，每二十分鐘。

本書分章的先後，並不依照事實發生早晚爲準，也不敢說是依重要性來分別等次的，却是：寫到那裏便那裏，求文字的聯貫性，似乎可使讀者的思索比較的可接續些的而已。這一點，我似乎應該一提。

上海，我想大家對之闊別已久，五六年，七八年不等，甚至於更攸遠了，它的近況，它的變化，雖然有些散見於報章或定期刊物上，自淞滬淪陷迄今，一直到目前，還沒有看到一部有系統的書。不知道這本小書能否給予讀者一個親切的素描，雖然，我們心自問是竭盡稀薄的！

當我未到上海去之發，所聽到的關於上海的種種，雖不涉於神怪，終覺得有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者是捉到某一角落裏的加以誇張的渲染。回來了以後，我所聽到的，也有讀到的，也仍有同樣的感

覺，似乎是大家都不耐煩的來一個綜合的報道。我不說，我的報道是正確的，因為「正確」這兩個字就很難了。怎樣才算正確的呢？我以為正確的，你也許以為不正確；現在可以說是正確的，將來也許不正確（因為事實的背後還有事實）；相反的也正如是。我認為正確的，我寫下來，盡可能的寫下來，成敗利鈍，在所不計。

爲什麼一個現象，兩個人看起來，一個會認為正確的，一個會認為不正確的呢？原因端在觀察的角度不同，和觀察的判斷力不同。我不敢說，我的觀察力特別強，但是我敢說，我是從多方面觀察的，取第三者的地位觀察到的。因爲我之去上海可以說是「去看看的」，別無其他存心，大有冷服旁觀的態度。於是，接着一定有人要質問我，爲什麼你要寫這一本書呢？除了已見諸於上文者外，我感覺到：在國內還有許多人，他們大都是從江南來的，懷着懷鄉病的也有，抱着掘金的念頭的也有，又回到上海去了，或者正想回到上海去。這本小書並不勸你去，也不勸你不要去；但是給你一個我認為正確的、多方面的參考資料、你不妨從此再考慮一下你的行動，或者正是一個忠告。

在上海時，時常聽到「天快要亮了！」，何時天才亮，雖然各人見解不同，然而天總要亮的，不但你我曉得的，深信的，就是在上海的日本人當中也有等天亮的。在天未亮之前，我們也似乎應該明瞭些黑暗時代的上海是怎樣的，也許在將來還僅僅是齊天野語似的一頁聊天，也許可作怎樣使黑暗的辰光縮短些的工具，早些叫輝煌的青天白日照耀到上海，那是我非分的企求。

到此爲止，結束前言。

一、「交還租界」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約簽字。在簽字的這一天，我告訴我們全國的國民說道：「我國自清季開始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到了去年（民國三十一年）正是百週年。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

——總裁：中國之命運

「八月二日的早上，有一個可愛的日本人——其可愛的原因寫在下面——一看見我就連說恭喜恭喜。我很莫明其妙，不知喜從何來。他看見我驚奇的樣子，接着說收回上海租界實在是可喜的事。我恍然大悟，連忙謝謝他。以前，我也有過同樣的經驗，那次是因為德義承認國民政府。」（指南京偽府）也許任何一個讀者會驚奇不置，當我說出上文的作者的姓名時。他是周逆幼海，周逆佛海的兒子，今春才從日本回來；上文載於他的「日本概觀」第一四一頁上。（周逆幼海著：「日本概觀」一書，在本書中，時常要提到或摘引的。此書之出版是偽區奇蹟之一。）

我到上海的一天，便是八月二日，雖沒有像周逆幼海所遭遇那樣的，就有日本人向我道喜；但所感覺到却正相同，其滑稽正與德義之承認偽府相等。而這一種感覺，我敢說，除了陳逆公博吳逆頌皋等

粉飾「場」接收「租界」的一班偽逆外，上海的三百萬民衆都是同樣的認爲滑稽的。

有人也許要說我說得太過分了；其實作如是觀念者，不僅周逆幼海，我，或者未昧天良的國人而已，稍爲聰明一些的日本人也許不能不承認這一套戲法——交還租界——並不能博得上海市民的歡心。

吉田東祐，宣傳「新政策」最力者，在八月一日的「申報」上寫了一篇「對於交還租界的幾個意見」，小標題是「說老實話」，內中就有如下的句子：

「最近有很多的日本人問我，此次交還租界，一般中國人在怎樣高興着？我對於回答這個詢問，倒是一件頂困難的事。……（中略）……那末，即使交還租界的理想與目的無論如何崇高，而租界上的大部份中國人都會無動於中的。」

他也早已肯定中國人，「租界」上的同胞，對「交還租界」的一椿有名無實的把戲是「無動於中」的。

租界是「交還」的，不是「收回」的，而「友邦」之「交還租界」是在中英中美新約訂過後七個月才上演的一齣戲。究竟「交還」了些什麼？「交還租界」前與「交還租界」後，租界上有了什麼變化呢？且讀下文：

欣逢 其會

八月一日我在甯波搭新甯紹輪動身的時候，已知道上海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同時「交還」的消息從甯波的「時事公報」，以爲船到上海時，可免去敵憲兵的檢查等等的麻煩。初踏進偽區的人總有這一種徼倖的心理。事實上，在甯波上船之前，固受到敵憲兵之檢查，船到上海才清晨六時，搭客却不許下船，據說是「憲兵尙未來」，等到九時，中國客人才開始

挨着等級下跳欄（「友邦」人士早已上岸到家裏了），最先是頭等搭客，然後是二等，三等，四等，踏上碼頭，先是海關檢查，檢查員便是「友邦」人士，傾箱倒篋之後，舉起皮鞋腳一踢（後來，我發現別人並未受到如是待遇，也就發現了我的「錯誤」，我未曾學別人的樣，才走到這位檢查員之前，在箱子未開之前，應向這位「友邦」產的檢查員先來一個九十度的彎腰，然後臉上浮着笑臉，方揭開箱子；那末，這位檢查員的態度就會比較的好得多），我也只得整理好箱子，再往鐵門走去；接着便是敵憲兵的檢查證明書（證明書大概有三種：上海的居民有「市民證」，甯波的叫做「居住證」，還有一種「旅行證」，那是「市民證」或「居住證」還沒有頒發的地方而旅行到有「市民證」或「居住證」的地方時臨時向警察局請領的一種許可入境的證明書，上面除了姓名，籍貫，職業，以外還有指模和照片的）和打針紙（即注射防疫針的證明書）。當時，我所有的「旅行證」與「打針紙」都是在甯波動身前向旅館茶房買來的，決非向「主管機關」去領來的，却也照樣有效；我敢說，在這類一點上，偽幣的效用較法幣大得多。

據時常來去於滬甯者談，此種檢查手續，恭候敵憲兵的習慣，以及領受「友邦」人士的「青睞」等等，此番與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完全相同。

馬路上的「警察」與「巡捕」還是一樣——這一點大概在一個月後有了變化，制服換了

改了；但是，的確也有改了樣的：

公共租界改稱為「第一區」，法租界變做「第八區」，雖然叫黃包車時，你還得說「法租界霞飛路」按照「上海市府」所頒布「命令」，應該喚作「第八區華山路」的。英法文原

名的路名，在三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公佈一律更改、路牌到五月一日還未全數改竣。

工部局改爲「區公署」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改名爲「上海特別市第一區區公署」。這種改稱對於一般人民，其效果還不是其路名相同。法院亦改了名稱，添設「檢察署」，諸如此類，都有煌煌明文更改增添。

「上海」降三級，他却以爲「榮任三職」呢！在偽區內，普遍的認識，官愈大愈沒有「出息」，「

市長」立法院院長」的「進益」遠不及「上海市第一區區公署署長」來得有味，陳逆公博之恬不知恥，竟然如是；最近「署長」一職由「秘書長」吳逆頌皋兼任了。（陳逆已「榮任」「代主席」了，這「市長」職終應該讓人了。）

在八月一日的報上發表的各「區公署」下的分區（如靜安區、新閘區等）警察局長都是日本國籍；到八月五日，又重新發表了一批警察局長的任命，此系則是中國名字。據說，有人認爲正局長都是日本人，副局長是中國人（那是原議），未免有礙觀瞻；所以，把他們對調了一番。其實，上海的警察權還不是在日本籍的副局長的手裏！譬如，去領一張「市民證」便必需從一個日本人的手裏才能領到。我現在有一張「市民證」，上面便寫的是「昭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責任者重田印」。（實際上，這「市民證」還有許多日文呢！類如「姓名」寫作「氏名」，「年齡」寫作「年令××才」等。）

警察 機構

關於這一類的事，敵方的代言人，吉田東祐說得好透澈：

「南京政府在現階段上，究竟是否比日本更善於處理租界行政，說一句老實話，這真是一個疑問。……」

「……假使南京政府在上海的行政上失敗的話，其失敗即是在全世界面前的失敗，同時，那也是給大東亞戰爭的一個大打擊，所以，日本也就不能默爾而息，說「與我無涉」的風涼話。由此觀之，交還上海租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深與南京政府的一種嚴重試驗，但這並非是單純的對南京政府的試驗，且是加諸上海市民的一個嚴重試驗，因為政治是政府與人民的相對關係，好的政治如無人民好的協助是不可能的。再進一步說，那也是課與日本的一個嚴重試驗，因為站在上海的現實觀點上來說，上海的善良政治如無日本的善良協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雖說把租界交還南京政府，但對於上海的行政，仍然需要監護人的資格好好加以注意，尤其必須充分注意對市民實際生活有重大關係的物資配給機構（其中最重要者為戶口米）和警察機構等問題。」

「在此，我要率直地說一下，關於將來的警察機構，在目前上海市民間有某種程度的畏懼。上海市民還記憶得很清楚，在滬西躲身於特別工作的名義裏，作過不少罪大惡極的勾當，他們捉人是爲了要錢，實在是一種政治綁票，這類政治綁票匪徒，雖然各自受到法律的嚴重制裁，但上海市民現在仍然認爲這樣敗類餘黨還有，且認爲此輩再捲土重來上海，發揮其爲非作歹的拿手好戲，則真有點「吃不消」；因此，在上海的警察機構內，都不應當再讓上海市民發生對政治綁票匪徒的恐怖心理那樣人的存在。」

【上文見於吉田東祐言論集第六六頁，第六七頁，及第六八頁上。】

他爲日方之干涉（不，其實是：仍舊佔有及包辦）上海租界上的警察機構及配給機構（除主要日用品的配給機構屬於日方控制外，公用機構如電車電話自來水等亦一律「軍管理」的），作有力的，而語調婉轉的辯護，甚至不惜痛罵偽府的不健全（例如上文重提滬西「七十六號」何逆世保的罪孽，何異剗苦僞府；這是敵僞之間的怪現象之一）以掩飾其侵略的行爲，彷彿日本之所以干涉租界行政，還是爲中國人民「好」呢！（這個「好」字可代表一切，包涵廣義的好）

我不是已經說過：吉田東祐是所謂「新政策」的宣傳者，「交還租界」當然是「新政策」的「實施」之一；而吉田東祐便作如是的辯護文字，當然同時他也替上海的日本人解釋租界雖「交還」警權不放棄的「苦衷」了！

太上市長

陳逆公博雖貴爲「上海市市長」，其實，上海有一個「太上市長」，他叫渡正監，官銜是「上海市市政府顧問」兼「上海市警察總監」。他的命令，他的權力，都比「上海市市長」的強得多。何況上海還有「大使署」，「領事公館」，「海軍陸戰隊」，「憲兵司令部」等「至高無上」的機關呢！

虹口當然是日本領土（！）型的虹口。

「新聞檢查處」是敵大使署與僞宣傳部共管的機關，「新聞檢查處主任」是堀由，副主任才是陸逆錫爵，而且還有一個「科長」，叫做佐伯信一（他的權力也比陸逆來得大，精通中國文字，上海話也說得很好。據說，在八·一三前就一向住在上海，一直沒有離開過，臉孔才段都不十分像日本人。）換一句話來說，上海的檢查機構也在敵人的手裏。

北火車站

北火車站更其「未曾交還」，買火車票之艱難，有口皆碑，不但普通中國人受到檢查和排班入站的麻煩；就是偽府的特任官員也感到不舒服，一不准掛花車，二不許帶衛隊；所以汪逆，陳逆，周逆等之來往京滬，大都是在真茹上車下車的。總之，偽府官吏進北火車站時，其遭遇固然比普通中國人要好一些，但尙不及一個普通日本人民來得方便。

租界究竟何日才正確的「收回」，日本何日才放棄他的「監護」地位，目前毫無朕兆；「天亮時」，我們才去接收租界。



中央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二、所謂「新政策」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
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孔子家語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

——盧杞

「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越世家

什麼是「新政策」

所謂「新政策」就是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敵酋東條英機之「日本對支政策之轉向」的宣言中所包含的一切，例如，在偽府「參戰」以後，日本將英美在淪陷區的資產移交偽府（日本方面稱之謂「敵產返還」的一個怪名詞），撤廢治外法權（？），以及「交還租界」等等具形無實的步驟。換一句話來說，日本之對偽府的態度，以及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在「新政策」施行之前，不啻已自認是壞的，在「新政策」發表之後，就變做「好」的了。（是否

「好」請看下文）

據敵陸軍報道部長谷荻的「日本與中國」一文中（載於「時局雜誌」，三十二年四月號上）曾有如是自說自話的句子：

「以往，中國的留學生對於日本報章雜誌登載的對支議論，或是對於自己接觸的日本人之對支觀念，抱有非常的懷疑。一言明之，他們都以爲日本對中國的方法，是傲慢不遜，僅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更超過英美之險惡……看見了一月九日日本對支政策之轉向，及這以後大陸的狀態，他們應該開始認識日本是真正的同胞，假使不與日本提攜，就沒有東亞的解放，東亞的和平，東亞的繁榮。」

敵駐華派遣軍司令畑俊六也曾發表過一篇「告日本兵士書」，無非是些「訓誡」日本兵士應該對中國人民表示好感的「公文」。

菲律賓，緬甸之「獨立」(?)及「印度國民軍」之成立等等當然也算「新政策」實施之一。

武者小路實篤的話

武者小路實篤，在「寄中國知識階級」一文中，也這樣的承認：（括弧內是我的註批）

「恐怕中國的知識階級全部對日本不抱好感吧，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日本）對中國做了壞事，所以不抱好感是當然的，我們自己也知道這個。現在大東亞戰爭開始了。我們（日本）對於英美已經隱忍自重七十年，無論如何非擊滅他們不可，其所以未能做到，由於在中國半路上發生了阻礙之故（此句甚妙）；然而大東亞戰爭已經開始了，所以請中國對我們（日本）惠予好意吧，對於勞苦過來的日本人給予了解吧！這樣已經很好啦，請不要客氣說出來吧！不好的日本人由我們（日本人）自己來對付。」

這些話富含「蜜」意；然而我們可從這一段文字中看出所謂「新政策」的命意，日本之所以要轉變「對支政策」，所以要對中國人從壞變好，都只是因爲發動了「大東亞戰爭」，對英美作戰了，迫不得已要「親鄰」了。

吉田東祐的名作

這一種意思的表示在「中國問題全面解決的可能性」一文中，更爲露骨。

「中日問題全面解決的可能性」爲吉田東祐所作，載於「申報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七號上，長約一萬四千言，相當的引起一般人士的特殊注意。他述明我國之抗日運動不受共產黨煽惑的（以往敵人的一貫宣傳），而是「其實這一運動的中心份子上海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主要的代表上海中小商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而續漸擴大的一種運動。」他雖避免民族主義的立場，在日本人方面看來，他的立論不能不說相當大膽的了。在這篇文章裏，他先駁斥「中國不斷鬥爭論」，繼之分析抗日運動的演進（內中當然含了不少毒素，但與敵方的一貫宣傳文字是大相逕庭的），現狀的觀察（更荒乎其唐的），結論的一段，小標題便是「日本的誠意」，有如下的文句：

「那末中國民衆的要求究竟是什麼呢？回答極簡單，即中國自主獨立之道。我們記得，以前日本和其他各國締了不平等條約時，日本人瘋狂如一頭雄牛，想擺脫歐美所給予的這一桎梏。正如這種日本人的愛國熱情一樣，現在中國人民，在熊熊地燃燒着這種愛國熱情。日本人需要理解這一點，需要站在同一亞洲同胞的地位上，體察中國人的愛國心，正因爲日本理解了這一點，所以才改換新政策。因此我們可以武斷地說，如中國人不懷疑日本新政策背後的事情，中日全面和平馬上就有可能。但重慶方面的民衆，由於過去六年的中日糾葛，則對日本的一舉一動，總是以猜疑的態度來應付。所以他們仍然在新政策的背後，看不見日本的誠意，而只看到日本的陰謀。日本對於他們這種心理，不應當馬上生氣，而應付這種情形的方法，只有默默無言地實行自己的誠意。中國民衆對於日本的誠意，如不是由於宣傳而理

解，如由日本的實踐而理解，則中日全面和平馬上可以實現。這是因爲，日本如能比現在的重慶政府更能感動中國民衆的話，那末中國民衆就會全體來歸的。

「然而日本的誠意證據，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因爲重慶方面的中國人，都在懷疑日本在事實上對中國是否有領土野心，但我在此處並不想說「交還租界」「撤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因爲對於從最初就抱着猜疑態度的人，單純的說明，是得不到什麼效果的。我因之在此處亦提供出日本誠意的客觀條件。

「在本文的開頭曾經敘述過：中日不斷鬥爭論者，在高喊着「日本需要領土，日本正在擴張領土中，擴張領土只有用征服方法才有可能，那末當然就會使這一戰爭成爲長期戰」，並以此爲根據，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日本業已把南洋奪來成爲自己勢力範圍，假如現在退一步或一千步來說，日本以前會要求中國的領土，即使根據這一假定，現在的日本，單單南洋這一片領土，已經喫飽了，吃了滿肚皮的咖啡飯後，再吃一餐中國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何況中國飯中還有不能吃的石砂呢。

「第二，目前日本在和英美作生死存亡的戰爭，這一戰爭決不是輕易樂觀的戰爭。如被解放的亞洲各民族不自愛地不肯站在日本方面與英美作戰，則日本的最後勝利是非常困難的。日本特別需要四萬萬中國人的強大協助，如整個四萬萬中國人全面支持日本，則此次戰爭的勝負早已決定，在那時，日本和中國兩大國家就可能決定全世界的形勢，所以，日本目前從內心裏在迫切地希望中國的協助。

「這兩個事實，無論在誰的眼中也可以看出來的客觀事實。假如今日的抗日運動是根據一九三五—三六年當時的客觀事實而不能不產生的新運動。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有重新估計日本誠意的必要；全面和平問題，有從新角度重新檢討的必要。當然，在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十分理解新政策意義的同時，也

可能想到，在實行時還會碰到許多不愉快的磨擦事件。但在這一新政策背後活動着的日本國民的意志是真誠的，即日本國民在確信，現在以武力解決中國問題是不可以的。……（下略）：」

這一段文字可以說是冠冕堂皇，娓娓動聽的；但是姓華的日本軍部與「興亞」官吏是否有予南京的偽府真正的「獨立自主」呢？「交還租界」已是這樣的一齣戲，治外法權毫無撤消的影響，「中央儲備銀行」的命根還是操在「橫濱正金銀行」的手裏（此點詳見第三章），日本對華的實施政策，在偽滿內，還是盡量榨取中國人民的汗血；而「新政策」施行之後的「鄂西之戰」「常德之役」以及去年之「中原大戰」，「湘桂侵略」，又將作何種解釋呢？然而吉田東祐却更徹底的承認：南洋的咖喇飯已經喫傷了，中國不是以武力可以解決的，而因了對英美作戰不能輕易樂觀，遂迫切地希望四萬萬中國民衆的協助。「好」話雖不由衷，而不得不對中國人說「好」話却是真誠的需要。

在吉田東祐發表了上述的一篇文章後，曾引起兩次有趣的問，他雖然也有自認爲合理的答解，却是狐狸顯原形遮不住尾巴了，露出日本的真面目，野心若揭。

第一次是陳逆孚木在「中國與東亞」雜誌四月號上，篇名「國民政府在強化邁進中」的文章中，認爲一般人民有如下的反響：

「東條首相來華，當然是空前盛舉，但日大首相也有到過台灣的，也有到滿洲旅順的。

「撤銷治外法權是值得欣慰的，但中國的法庭真能審判日本人嗎？」

「交還物資的統制確是很好的，但渡邊顧問會表示今後各地還要聘請日本經濟專 協助，這幾年以

辦事或許還有些效率呢！

「南京政府有成績也好，沒有成績也好，等待大戰結束後再說罷，現在來說還嫌太早。」

吉田東祐對於這些質問不敢作正面的回答，却從側面來「駁斥」這種質問的基本觀念的錯誤，他認為這是中國知識階級騎牆主義者的錯覺。他說：「載於吉田東祐言論集第五〇頁上，標題是「中國知識階級的騎牆主義」」

「中國民族究竟保持了與冠絕世界的日本陸軍鬥爭六年的傳統，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新加坡、馬尼刺的英美軍怎樣不是日軍的對手，望風披靡。日本軍人承認中國軍隊較英美軍為頑強而富於勇氣。在這一點上，中國知識階級對中華民族的力量，不能不稍為保持一點自信。假使中國與日本合作起來把槍頭指向英美，「世界戰爭決定於亞細亞」並不是難事。……」

顯然的，他簡直來拍中國人的馬屁了，而把答覆上述的四種質問的責任委之於南京的偽府，而說「你們應該對南京政府要信任一些呢！」可說是圓滑之至。但他，却在無意中承認中國陸軍是「皇軍」惟一的「頑敵」；而他，一個日本人，心目中也肯定一般的中國人民並不對南京偽府稍存信任的。

第二次，他收到了不少無頭信，從「申報」的信箱中（因為他也是「申報」的顧問，陳逆彬齋的護身符之一）。他居然自己把牠發表出來，那些信中爽直地指摘他：

「你不看中日關係的現實，而祇說理想的中日關係，在客觀上，你是擁護九·一八以來的日本立場。」

他忍不住了，竟露出猙獰面目，作下列的答詞：（載於吉田東祐言論集第六三頁上，標題為「解決中日事變的曙光」）

「但我祇有一個反問，「即祇在亞爾薩斯羅林二省的誰屬的問題上兜圈子，那末德法間能有何種合理的和平解決方法？」如祇說過去的事實，而忘記目前的情形，必然的結果，其解決方法祇有訴諸武力的一途。假如，站在這種立場上來討論中日問題，那末結論將是：與其我們訴諸文章討論，倒莫如訴諸其他更適當的方法為妙。」

圖窮七現，他居然認我們的東四省為德法之間的亞爾薩斯羅林二省了。他在另一篇文字中復引用普奧戰事來譬喻「新政策」前的中日戰事：（載於吉田東祐言論集第二六頁上，篇名為「日本之對華文化政策與中國知識階級」）

「所以，對於中國事變而抱不安之感的日本人，隨着大東亞戰爭的勃發，方始由衷稱快，心裏方始覺得舒服。那事情正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於一八六六年聯合法蘭西去和奧地利興起兄弟戰爭，其後於一八七〇年對於其宿命之敵法蘭西人宣告普法戰爭時的事情相似。普魯士人對於普奧戰爭之際，凡是德意志人的同志，都深覺兄弟相爭的不安，然於普法戰爭之際，方始理解俾斯麥的政策。日本人當此大東亞戰爭之際而稱快的心理正和這普魯士人的心理相似。……」

不打自招，日本的「新政策」還是自以為東亞的主人翁自居，而我國不過是「奧地利」而已。所謂合作，還不是併吞。不知德奧是同文的國家，亞爾薩斯羅林的居民德法各半，而中日的國民性的各別，民族血統的迥殊，又何能指鹿為馬呢！

關於「新政策」的「宣傳」文字很多，我以為上引的種種已經够了。總之，所謂「新政策」不但在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即以吉田東祐本人所寫的就自相矛盾若此；睽之事實，更

不打自招
野心畢露

證明言非由衷，第一章已詳述「交還租界」的活劇（日本對「交還租界」一事還向南洋及其國內大事宣傳的呢），下一章裏，我將敘明敵人如何榨取淪陷區的民衆的汗血，在過去一年中，這些當然都是「新政策」聲明之後的事情，具見出爾反爾，言行不符的日本的實際行爲僅僅更顯示暴敵的狼狽狗心。



三、上海的經濟縮影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

——北堂書鈔

在上海時，時常在無意之中，遇到重慶桂林或昆明的朋友，更從親友中聽到「誰也來了」的音訊。我敢相信：從浙皖的「孔道」上絡繹着往來於「自由區」與「和平區」者目前仍頗多（凡在「陰」「陽」界跑來跑去者都以「和平區」代替「淪陷區」，而以「自由區」作「抗戰中國」的代名詞，不亢不卑，兩不觸犯；對於幣制亦如是，不稱之曰「法幣」「偽幣」，而呼之曰「老幣」「新幣」，從這些，我感到我國文字的玲瓏）；恐怕還有許多人正憧憬着上海的繁榮，現在我給你們看一張圖畫，不，那簡直是一幕電影，有故事，有情節，怪驚險的。

那又是一樁欣逢其會的事，我於去年八月二日到上海，正是上海市面上紗布價格高漲到顛峯的時候，大概是八月十二日吧！偽府下令統制紗布。

紗布 事變

這決不是「統制」，而是「強搶」；我記不起那「條例」的原文，那時候我也沒有寫這本小書的準備，那內容大概是：

這時候，紗每包價格大致是三萬元，偽府下令收買的價格是一萬元，而且那一萬元需分六次償還，

第一期在下令之日起三個月後開始，每六個月償還六分之一，三年另三個月始償清，償還的並非現鈔，而是「金券」，「金券」可以向「儲備銀行」作抵押，八折貼現。簡單說來，一包紗原值三萬元，當時變作零，一錢也不值，三個月後可收現款一千三百三十餘元。那還是按照統制法令，依法登記者的命運；倘若匿而不報，查出充公，並受法律制裁。

據專家統計，紗布一項占當時全上海的物資總值的四分之一，可想見這一樁「劫案」的影響之大。（此項統制令之頒布，事前異常秘密，偽府首要亦多莫明其妙，對於握有紗布棧單者，此何異於晴天霹靂，白晝遭劫耶！）

上海的旅館中就發生了好幾樁跳樓自殺的事實。試想：一個人，假定他本來有一二百萬元的私產（在一年前，三十一年八月），將財產之一半或四分之三投資於紗布，那時候紗布的價值是五千元一包，一個月後漲到一萬元一包（假定，也是可能的事實），於是他將原有的紗布棧單向銀行做押款，復將從銀行借來的錢去買紗布（那時候上海各銀行對於紗布押款幾乎可以做到不折不扣），買到之後又去做押款，將銀行借來的款項再去買進紗布，如是循環，而紗布價格日漲月大，假定他在三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以前，手中有紗布棧單一千包，依當時市價估計應為三千萬元，同時他欠銀行借款一千五百萬元，那末，他的資產與負債相抵，應為一千萬元上之富翁，在紗布價格只看上漲的當口，「統制令」未頒布之前，這是毫無疑義的；吃的用的當然相當闊綽，妻妾兒女嬉笑開逸，那「統制紗布令」一下，他的三千萬元化為零，而欠銀行的一千五百萬元倒非還不可，支票簿不能簽用，當然啦，這種人同時也許也經營些其他的生意，但為數太小（即使這種其他款項達數百萬元之鉅，但對他也是「小」的了），決不能彌補

這鉅大的虧損，銀行雖有棧單抵押，又值抵押品的價格驟跌，當然立求追償（此種抵押借款多屬短期，本來可以到期付息轉期的），況且當時各銀行錢莊的本身就已岌岌可危（同受「紗布」之累）豈有不同欠戶窮兇極惡地討債之理，在這一個人本身想來，宛如一場春夢，做了一年的大富翁，突然變作乞丐都不如（乞丐決無終身不能償還之欠款），既慣於這種紗布投機的生意，又不習於其他謀生之道，一時更決無再向他處捺借鉅款之可能，惟有一死了之，則銀行欠款因本人死亡而不了自了，他的家中倒還可以藏起一些首飾，日用品等其他資產，免強得過小康之家的日子。

在紗布投機盛極一時的時候，每條馬路上幾乎都有紗布字號。我的家鄉離上海有三百餘里的海程，全城居民不過三萬，當時有紗布字號三十餘家，以上海的行市而做生意，所謂「聽筒」之流也，現在當然都閉歇了。沿滬甯路一帶的各城市更可想見。在上海，整個上午的電話線路幾乎都給紗布交易所佔據，「統制令」一發表，不但紗布交易所停業，這類字號都烟消雲散。據說，這一來，上海的上中階級的富戶（平時財產估計在七八百萬元以上，二三千萬元以下者）大部被「解決」。邵逆式軍一人破一憲兵所沒封的紗布，達七千餘萬元之鉅。（其親信譚逆熹且為敵憲兵部拘禁一星期）因為紗的每包單價價值過大，故影響所及，因而傾家蕩產者尙非中等階級的商民，至於紗布字號的職員們，他們大都改業股票投機了。失業的當然亦不少。

虹口方面的日商所有的紗布，在第二日，也下令統制，彷彿一視同仁，毫無軒輊，其實國人握有巨額紗布棧單者多非開設紗廠者，而日人紗廠的規模較大，仍可領回（因為「統制令」的內容，初步是在封，收買，原則上還是要「配給」給各紗廠及棉織廠的），故損失甚少，影響毫無。

據說，李逆士羣之被害，拒絕查封紗布亦是成因之一。

現在紗布都歸「軍管理」了，大部堆積在跑馬廳裏，你就可想像得到那「劫案」的主謀犯是誰的了，僞府下令還是被迫出此呢！

於是，上海人一窩風似的集中於股票投機了。

股票事件

上海之有股票市場怕已有四五 years 了，但決沒有「紗布事變」（上海人簡直這樣稱呼之）之後那樣的繁榮，交易所也合法成立了，由藐視法令而變為法律明文所許可了。在股票交易尚在「黑市交易」的時期，流行市面上有華股洋股之別，正式的交易所成立後，洋股就在拼棄之列（因為僞府明令禁止），而新股票也就如雨後春筍，紛紛上市，一個股票交易所經紀人的號碼（上海商人習語，即為「一塊牌子」）從十五六萬元一直漲到五十幾萬元，就可想見這一種投機在三十二年下半年的盛況了。

股票的本質，投機的成份雖多，也有物資的成份，例如「公司」（指永安先施等百貨公司），紗廠，文化（商務，中華，世界等書局），藥廠等股票；在上海人的一般心理中，百貨既然只有漲沒有跌，股票必然也有漲無落，即使在某一時期略有回跌，終究是會上漲的。股票價格的單位小了，最普遍的十元一股（最高的大概是大中華火柴公司的股票，每股票面一百元，市價最高達七百餘元），誰都可以從事於此。商店的夥計（只要他略有積蓄，二三萬元的資本就可下手，一個月中亦有獲利二三千元的「把握」），公館裏太太，甚至於青樓的妓女（四馬路一帶的長三書寓）都與股票發生關係；小銀行，錢莊，股票字號當然更整天的忙着每一小時的「行情」，大資本家復從事於操縱市面。其情況之普遍與熱

開實較「紗布時代」爲更甚。

三十二年年杪（尤以舊歷爲更顯著），股票一致回跌了，大家以爲這是必然的現象，年關接近，銀根吃緊所致，「不足爲訓」。富裕的人有些還變本加厲的買進，以爲「新年」一過，大家等着看「紅盤」好了。誰知「初六」（指舊歷）開市，股票市價不但不漲，而且下跌，一過「月半」，跌風更烈，以國黨而言，從二月中旬開始，一直到三月底，股票價格從未回漲，可說是「慘跌」了。大部份的股票市價都回跌到一年以前的價格（有些甚至於跌到一年半以前的市價），新上市的股票都跌進票面以下（十元一股者市價最慘者爲六元幾角）。到我離開上海時（三十三年四月下旬），股票市面還是慘跌非凡；市價較三月底略見回升，但仍不及一年以前的價格，而交易稀落，形勢未見好轉。（這種情形據續到情報一直到偽幣貶值才改變呢。）

這一來，把中上階級（個人私產平時估計約在數十萬至二三百萬元者）都解決了；本來靠股票交易過日子的，在一個月中突然就感到度日艱難了。假定：一個人有三四十萬的款子可以調用，本來藉股票交易的進益，每月有三四萬元的收入，五六口的家庭就過着舒適的日子，現在呢，三四十萬元的資產突然貶值了，下降到價值二十萬元左右，銀行錢莊的款項也就不能再予通融，而進益毫無，豈不日對愁城了麼！至於另一種人向來藉借銀行款子做股票生意者，那就根本走頭無路了。

這股票慘跌的現象雖不及「紗布」那樣的顯而易見（每日逐跌的）；但影響所及，其普遍性却比「紗布」更烈；而倒霉者可以說完全是中國人，日本人絲毫不受影響。

股票市價何以會如此長時期的下跌呢？

那簡單的答辭，也就是原因，是：「銀根緊，銀根奇緊！」然則何以銀緊會如此奇緊呢？

偽「中央儲備銀行」在舊歷年關之後，開市時不予各商業銀行放款，有以致之。在「年杪」前，各商業銀行（當然包括錢莊在內）本來等着「儲備銀行」在「開市」後放出五十萬萬元的款額，（向例如此，各商業銀行於年杪償清，年初再向「儲備銀行」透支）結果却是，「儲備銀行」非但不放款，並且向各銀行催收欠款；同時偽財政部發表「管理銀行條例」，不准各銀行自由放款。當在年底年初的時候，百貨價格本因供需關係自然上漲，於是銀根不緊而緊，緊而愈緊，甚至於造成百貨價格驟跌，米價每石由五千五百元跌到二千八百元（三月下旬時的現狀）。除了「儲備銀行」不放款於各商業銀行的一個因素外，更兇的一個因素就是外灘銀行（主要的當然是敵人的「橫濱正金銀行」）拋出現金（金塊金條），吸收偽鈔，因之市面上籌碼更感缺乏，甚至於「儲備銀行」亦感頭寸短少（這一點也許有人要奇怪，偽鈔爲「儲備銀行」所發行，何以「儲備銀行」會缺少偽鈔呢？其實，偽鈔之發行權在「儲備銀行」，偽鈔之印鑄及運輸都操縱在日人的手中，因爲偽鈔現在是在日本印鑄的，何況「儲備銀行」的最高權力還在日本顧問的手裏！），銀根那得不緊，百貨尙且因之下跌，股票比較的總是一種空虛的資產怎不大跌狂跌呢！

何以日本要造成這一種現象呢？

銀根一緊，偽鈔的價值便提高，百貨因之下降，食糧亦隨之下跌，當時又適值太湖附近各區早稻收穫的時候，所以，日本方面將現金放出，吸收偽鈔（當時上海黃金的价格是先漲後跌），將偽鈔向四鄉收購大批糧食及原料；換一句話來說，廉價採購軍糧及原料也。他們當然不復顧及上海商人的叫苦連天

的了。表面上，偽府還替之高唱其「壓低物價」的「政策」，彷彿敵人之放出現金，偽行之停止放款，還是「爲國爲民」呢！

實際上，淪陷區的物資又大量的被敵人以廉價榨取去了；這一個時期一過，百物一定騰貴，到五月十日，上海的米價（據中央社屯溪電訊）果然已突創新紀錄，六千五百元一石了，到最近更超出七萬元。敵人又何嘗顧及民生民食呀！

在三月中旬，上海小銀行倒閉兩家（一家還是林康侯的董事長），錢莊停業更多，許多「大少爺」變做了馬路上的「癩三」了。

總之，上海（淪陷區的經濟總樞紐之一）的整頓經濟是採縱在敵人的手中，他們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榨取豪奪中國人民的汗血，一般商人的命運也就在他們的掌握中，「紗布」「股票」僅是在這八個月中的「戲法」而已。據說，日本的經濟顧問們，除了將次第實行各種主要物資的統制外，不久的將來，就要利用「保甲制」來澈查國積，挨家落戶澈底清查，這一來，不知上海的居民將何以圖存呢！（據最近消息，敵人已予實行。）

謀生之道

至此，也許有人要問：「難道上海人沒有其他的謀生之道麼？」

那當然有的，在上海，三百六十行還是行行存在，工廠照樣開工，商店照樣營業；但是都非仰仗敵人的鼻息不可。譬如工廠，原料大部是配給的（所謂「配給」是由敵軍部爲主管機關，據說是按照需要予以定量分配。例如戶口米，每十天爲一期，每口可購二升，由保甲長按戶分給購買證，在指定日期內向指定米店以限價購得之。限價與市價有別，如戶口米每升爲八元，市價則爲五

十元。對於工廠之原料則以各工廠之生產量經調查批准後，予以配給，此項工廠之製成品即有限價之規定。；出廠價格是限定的，利潤也是「軍」定的（但有是可以用賄賂的方式，請求提高出廠價格；這一點可以從限價不是按步就板的上升的情形看得出來的，譬如，普通襪衫的限價在三十二年八月份是一百五十元一件，九月份是一百八十元，十月份就陡漲為三百元，諸如此種不勝枚舉。據說這種賄賂是同業公攤的。）；商店何嘗不是一樣。但定商人總是刁滑的，在貨價低賤的時候則囤積之。凡是任何一種貨物限價在黑市價之上的時候（限價貴於黑市價，在上海並不稀奇），市面上一定缺貨，商店就不陳設在櫥窗裏；所以，上海時常會發現某種日用品突然絕跡市上的現象。譬如，襪衫的限價陡然提高，高於當時的黑市價格，在商人的腦筋中就想到那一定原料上漲所致，不久的將來，襪衫的黑市價一定飛漲，就將「配給」來的襪衫（工廠對於商店亦等於配給機關，大家都搶着想囤積物資的）囤藏起來，櫃面上所陳設的都是十二寸以下或十六寸以上領圈的襪衫，使顧客望而却步（因為向來有襪衫出賣的店舖，櫃面上不能沒有襪衫的影子）。這是一例。總之，在上海，任何人不否認：不犯法就無法謀生。（上述之例便是囤積當然犯法。）

最近傳來消息，在上海，香烟也配給了；那末，中國人所開辦的香烟廠一定又要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本來上海的香烟只有限價，而非配給，限價烟並非個人買得着，既經配給，烟廠的出廠價格就剝削了原有的利潤。

走單幫

除了三百六十行之外，「走單幫」或「單幫客人」相當普遍；這就是內地所謂「運輸商人」的一類生意，但「單幫」與運輸商人有別，運輸商是合法的，他們付稅納捐，把甲地的出產品運到乙地以供給乙地之所需，合理的貿易；但在淪陷區內，敵人是限制物資移動的，貨物搬必需領「護照」，像上海，從這一條馬路把二令以上的白報紙搬到另一條馬路上就要請領「移動證」，否則馬路上的警察就可干涉。紗布統制後，布疋就不許在馬路上搬來搬去（個人所帶當然為法所許），甯波蘇州等地的布價當然比上海來得貴，小商人就設法做這一種生意，請求「護照」非日商不可，化錢向日本浪人「購」買護照，亦非小本經營者能力所及，於是「單幫」之法尙焉。

十一二年前，我在廈門。時常在海濱散步，恰有從台灣開來的船停泊，看見船上下來的搭客二三百人，每人的行李都是兩隻箱子一隻油蓋，滿貯着各種各樣的簇新日用品，千篇一律，覺得很為奇怪。查詢之下，原來這班台灣人專門是逃海關稅，而運入貨物，譬如，台灣的糖西廉，但海關稅率甚高，假定海關稅則限定每人許隨身攜帶五斤，不必納稅，五斤以上就必需依照稅率納稅，這二三百人每人就只攜帶五斤，那末一上岸一湊集就有一千多斤，其他的貨物也是每人當隨身行李攜帶，海關的檢查員雖然明知道他們是結幫逃稅，但也對之無可奈何，無法禁止，也無法課稅。據說，那時候日本輪船公司還鼓勵這一種結幫逃稅的行爲，把川資定得很低廉呢！

現在，在淪陷區內盛行的「走單幫」就是抄襲這一種「故智」，而且變本加厲，有許多婦女來私帶小量的違禁物品，所以，現在淪陷區各地的輪埠，車站以及關隘都有女檢查員的設置。台灣人是結幫的，中國人却是個別行動，使偽海關及敵憲兵更感到頭痛。

譬如：頤中烟公司所出的大英牌香烟，假定在上海，限價是四元八角十支（頤中烟公司在上海是被認為「敵產」的，早歸敵方沒收，屬「軍管理」，故其出產品為配給物資之一），黑市價為八元十支；在甯波，大英牌香烟就沒有限價，烟紙店出售的價格大概是十元十支，「走單幫」的到上海總可以設法購得半限價半黑市的貨物，一半去排隊依限價買得，一半向攤上以批價購得，大概六元左右可以買進，從上海隨身帶到甯波賣出，豈非有利可圖！

又譬如銅元，每一個十錢的銅元，在甯波，大概可以一元四五角收進，到上海可賣三元一枚。諸如此類，任何兩地的物價總有這一類的差別。

本錢小的人帶些價格低廉的貨物，四五千元的本錢變成兩件行李當然不成問題，幾次順利跑過，本錢變做二三萬元了，兩件行李亦可隨身攜帶，因為所買賣的貨物的價值揀昂貴些的了。

不論是船隻，是火車，甚至於是步行，僕僕風塵者幾乎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單幫客人」，淪陷區內及「陰陽界」上，這一種鏡頭可以說遍地皆是。

然而為法令所准許的貨物，所准許的數量，其獲利總不及違禁物品或大批偷運來得倍蓰；所以，「單幫」也有充公的，也有賠本的。現在交通工具日見缺乏（輪船被我機及盟機或潛艇所擊沉的日見增加，上海至甯波間的航線在三十二年八月有四艘，三十三年五月僅二艘了；火車亦時常要出險），統制物資日見嚴厲，而偽海關，偽軍隊，及偽稅務機關多方勒索，無所不用其極，「走單幫」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艱難了。

娛樂事業

「上海的娛樂事業總還繁榮麼？」一定有人要提出這樣一個質問。滿街的霓虹燈光一定還是閃耀的，舞榭酒樓一定還是座中客常滿的？不，我的回答是一個絕對的「不」字。從三十三年三月十日起，上海已宣佈「永遠燈火管制」，一到夜裏，馬路上昏暗如漆黑一團，「剝豬羅」倒處橫行，劇場、舞廳、酒店、菜館、咖啡座以及任何娛樂場所的生意都一落千丈，門可羅雀。（參閱第六章及第八章）

目前的一種新興「事業」（其實不能用「事業」兩字）是點心店，什麼「湯糰大王」「餛飩專家」「菜飯大王」「小籠包子」等招牌倒處都見；一開間門面，桌椅簡陋，倒新開張的不少，霞飛路上也有，戈登路上也有（在往昔，霞飛路是法租界最漂亮的馬路，戈登路是公共租界的高等住宅區）。讀者就可想像得到上海的末路了。一般人沒有財力上館子喝酒嘗菜了，只得以湯糰包子當做午餐晚餐了。

上海人，到了目前，除了已經感到求富之道困絕，謀生之術不易，而且對「財產」這一個名詞發生懷疑了。

什麼 是財 富？

什麼是可靠的財產呢？那一種財產可以在戰後還算做財產呢？（以下都是上海人的自白

）
偽鈔，「中央儲備銀行」的鈔票是靠不住的。那靠不住的理論有兩種：一說是出於愛國心的，「天亮時」，國軍克復上海時，這偽鈔一定不值錢的了，偽府既經把法幣禁止在上海施用過，中央也會把偽鈔以一紙明令視為廢紙的；另一說則是根據經濟原理的，這一般人以為即使中央回到上海，上海的人民終還是中國的人民，終不至於將偽幣一筆勾銷，使上海的人民連飯都

沒有喫，但上海的物價突飛猛進，米在戰前是八九元一石，現在已經六千五百元，倘若以強制禁用法幣的時候二元法幣折合法幣一元，的過程算進在內，米價幾乎已經漲了一千五百倍，一年漲十倍，甚至於百倍是不作為奇的，現在的角鈔已經失去其效用，一元券的用途已狹窄得很，據說，「儲備銀行」已經印鑄了五百元券，無限制的發行，鈔票的價值必日趨低落，那有什麼用呢！何況國軍回到上海時，偽鈔的價值一定比法幣低得多。

「儲備銀行」既靠不住，銀行存款也靠不住；事實上，現在，誰也不會這樣愚蠢，把現鈔存在銀行裏生息的了。

法幣，上海人暗中貯藏法幣的是有的，而且有時還有黑市價格。當我剛到上海的時候，上海溫州間的匯水是七五（那就是偽幣七十五元合法幣一百元），但在上海當地的黑市價格却是一元八角偽幣買一元法幣，據說，抗戰以前所發行的紙張完整的還可以高一二角。但貯藏法幣在目前的上海是「違法」的，有危險性的。法幣賣買的黑市術語叫做「老貨」。

美金，美金公債，美金儲蓄券，在上海都有黑市。美金，在黑市術語，叫做「綠貨」（那大概因為美金鈔票有一種叫做「格林倍克」，譯意當是「綠背」，所致）；小銀行或錢莊的職員頗多專做這一類交易的掮客。美金黑市價格有相當標準，隨黃金市價漲落，例如上海現在黃金每兩為一萬八千元，以百分之一計算，美金的暗市價格約為每美元值偽幣一百八十元左右，當然供需多寡也可使價格略有升降，票面的大小，以及紙張完整挺直，有無油漬等都影響到賣價，但這類因素都不過在尾數上略有高下而已。貯藏美金固然也是違法的，但美金券究竟小巧，容易躲藏；然而也不能不說有被敵憲兵抄查的危險。

公債及儲蓄券的黑市價格約爲美金券之對折八扣，而且沒有美金那樣的普遍。總之，這一類資產，在上海，的確有人冒險貯藏的，爲數雖屬有限的。

黃金，雖然有公開的市價及黑市價（較掛牌再高一成模樣），但貯藏金條也是犯法的。

現在，我來講一樁故事，不，這的確是事實，內中角色我都認識。

張某（姑佚其名）在上海是一位有名的「俠客」（借了人家的錢不想到償還，拿人家的東西當做自己的，決不正當謀生，而舉止闊綽，揮霍無度者），住則最豪貴的公寓，出則自備汽車。有一天，他攜了他的「膩友」坐了汽車，到大馬路上接近外灘的一家最高貴的女人服裝店裏，當他的「膩友」正在揀選和量裁大衣或旗袍的時候，他就與這家服裝店的女主人露絲（姑以「露絲」呼之，爲香港華僑）談天，他問：「你有金條嗎？我有一個日本朋友，他有點是錢，但不能帶回日本去，最近他回國去了，想買些金條，價錢到不在乎。」女人總是貪小便宜的，而露絲是富裕的，貯藏些金條，當時就講妥了價錢，約定於第二天送去。翌日，露絲派人送去九條金條，約值二百餘萬元，拿回來的是一張支票，結果支票不兌現，兩下就發生爭執，後來由范某律師從中調停，把支票換了一張筆據，寫明分期付款的句子。但到期張某仍置之不理，露絲終於以詐欺取財罪向法院控訴張某及范某。法官詢及所欠究屬何款，露絲無詞可答，而律師范某反藉故向之索詐，謂擬向敵憲兵部密報，私藏大批金條，「既有九條，必有廿條三十條」等語，張某則以有渡正監（卽上海的「太上市長」，張某與渡正監之關係詳見第七章）爲護符，有恃無恐，根本不理，到我離開上海爲止，此案仍成懸案；她非但不敢再向張某范某控追鉅款，而且她的丈夫還正在設法疏通范某，倩其就此掩旗息鼓呢！

上海本來是萬惡之窟，至今更甚，古語說得好，「懷璧其罪」，到了現在，這句話完全兌現了。

股票，勉強的可視為投機的籌碼，當做財產就太少可靠性了；公債（九六公債上海有一時期有黑市賣買）的價值也是相等的，據說，偽府將發行公債，那當然更不值錢了。

不動產，在戰前，是最可靠的財產；上海的所謂「英冊道契」誰也認為永不貶值的。到了現在，地產的價格仍舊往上漲，雖然比不上物價那樣漲得快，但是否可靠尚成疑問。依照偽府所頒佈的「戰時租賃條例」（大概是這樣一條法律），房東沒有權力叫房客出租的，就是加租也微乎其微的。房產出賣轉讓，房客亦可不必要遷移的；所以，房租在今日的上海可以說是低廉之極，除了一筆頂費異常昂貴之外，僅占每一個家庭日常費用百分之幾而已。總之，大房東想要靠房租收入過日子是難乎其難的；若以房產的現價值與所收房租對比折合利率，大概年息一二厘之譜而已。然則房產價格何以仍舊上漲呢？推究其故，建築材料的猛漲是一個因素，鈔票多的人設法保留其財富，遂不惜重價收購房地產，也是一個原因。然而在偽府註冊的不動產將來國府的土地局是否認為有效？土地局登記證未移交者將來是否可担保沒有糾葛？出賣者的共同所有權人之一現在不在上海而無從徵得其同意，將來是否不發生訴訟（可能的情形，買進者並不知有此種的共同所有權人，例如，甲將其房產出賣於乙，甲之子恰在重慶服務，將來甲死亡，丙於國軍克復上海後來滬，佔有其父所遺留之產業，乙是否有抗辯權，頗成問題）？所以，不論目前在上海房產賣買的手續怎樣週詳，我認為沒有萬全的辦法可担保將來不發生法律上的爭執。報紙聲明是最無聊的手續，現在的上海任何一張報紙將來必不能發生任何法律效力，何況你今天在上海登報聲明置產，下一個月重慶有人登報否認，試問那一張報上的聲明有效呢？

動產，除了日常所用之外，過於多了便成囤積，囤積必有被澈底抄查的一日，一經查出，充公還是客氣，本人還有受法律上的制裁的危險。

在上海，朋友之間隨便瞎說，大家都想不出一種可以保留到戰後的財富。上海的「暴發戶」也正在煩惱「着呢！

所以，上海也正有人愁着：「天亮時，我們怎麼辦呢？」

四、一般的心理

「秦檜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諷高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宋史岳飛傳

第一 個 意 料 之 外

當我離開了國軍的防地，經過了游擊區，踏入「和平軍」偽第十師的管轄地，奉化縣的白杜鎮，我遭遇着在偽區內第一次的行李檢查。我以為這沒有多大問題，很泰然地將箱子打開，孰知那偽檢查員對「M1918式盟機上所用的重機槍彈壳改製的一把小刀（在我以為是一件好玩的禮品，預備送給上海的朋友的），發生嚴厲的查詢，我就將彈壳拆開，顯出那柄不過可以當裁紙削筆用的小刀來，並向之解釋，「這不過是一件好玩的桌上陳設品，並非武器」。但他並不表示贊同，搖搖頭，繼續着他的搜查工作；又被他搜到了一大堆的名片，上面都是些軍委會，省政府的官銜（這當然是我的疏忽所致，我在桂林動身之前，不知怎的沒有把這些東西清理却）；這一來，我懷然了，以為「這可糟了！」。當時，我只得說，「呀，奇怪得很，這些東西怎末會在我的箱

手裏的！」他看了幾張，對我說：「這不可以的，丟了吧，你幸虧遇到我，倘若遇到日本憲兵，那便麻煩了，丟了吧！」我當然惟命是聽，將這些名片丟在附近的牆角落裏。那把小刀他拿在手中似乎有些愛不忍釋，我也只得將那把小刀奉送了給他，收拾行李，也就過了關。

這簡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一個偽軍的檢查員，親眼目睹着那些名片可證實我是「重慶份子」，不但不把我扣留起來，反予我以忠告：「給日本憲兵看見，可就麻煩了」，那使我的甯波話說得够有鄉土口音，他也未免太胆大了。後來，我不再以我原有的心理來看待這一般目下爲敵人作儀的偽方官吏了，他們的天良竟未泯滅，對他們也可以談「抗戰必勝」的道理的。（當然不是對任何一個）

第二個意料之外之意

到了上海，住在旅館裏，第一樁事當然是我親友，在電話筒中聽上去，他們都覺得很爲驚訝，「你來了，你怎末來的，好的，明後天我來看你……」；明後天，他們來看我了，也不過說了三五分鐘就走，彷彿都很忙。後來，我知道了，他們很怕和我接觸，因爲我是從重慶來的。再後來，我們之間一樣的是可無話不談，恢復了昔日的交情，而且都特殊的歡喜明瞭些抗戰的真實情形，時常到我房裏，聽我講述，深夜不休。

後來，我恍然明白：奉化的檢查員是自以爲罪孽深重，對我的待遇則是廣積陰德；上海人則是在①怕生事與②我刺激的矛盾中過日子；而都有「天就要亮的」的基本心理存在着。

矛盾的心的理

一般的上海人對於「最後勝利」之來臨要比大後方的民衆來得樂觀，在他們的心目中，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他們對於上海報紙上所刊載的電訊，都存着猜疑的心理；偶然敵軍部發表自認輕微失敗（？）的消息，大家就認爲敵人即將崩潰的預兆；敵參謀總長杉山元撤職

由敵酋東條自兼的一則新聞露布後，有許多人就認爲盟國的海軍即將進攻日本本土了，敵軍閥即將瓦解了。或者從短波無線電中聽到了一些盟軍的捷報或我發言人的廣播詞，大家就誇張地互相傳述，誇張到使聽者不得不相信的程度。

更有趣的，對一個剛由大後方到上海去的人，他們一定會搶着指示給你看：十元券的偽幣上印着「十集」，五元券上圍着「狐狸的尾巴」（的確很像），五角券上印着「中央來了」四個小字（用顯微鏡看來，的確有這樣四個小字）；而接着便講述那刻鏤板的匠工怎樣逃亡的故事。

右上一章裏，我已經說過：法幣，美金公債，美金儲蓄券在上海都有黑市的價格，而且比重慶來得高；關金券也有人肯化三十餘元合關金一元買進。他們（買進此種券債者）要的是紙張完整，沒有油漬（目的在貯藏耐久），票額較大（易於密藏），印刷精良（不致偽造）；推究其心理，的確是怪可憐的——他們既未會看見過財部頒發公債的儲蓄券的明令，也無從鑒別公債或儲蓄券的樣本和簽印的真偽，又根本沒有辦法將這類券債隨時兌現；所以，他們之所以買進的心理是：①本人偽鈔太多，②下意識的愛國心理，③轉賣牟利（其實也是利用一般的愛國心理來賺錢的）及④如上一章所述保留財富，就不惜冒險購買了。此是一例。

三十二年九月初旬，上海時常舉行防空演習，慣例總是前一天或當天的報上先公佈的，有一次却是臨時突然被放警報的（據說，這次是真的，南京郊外龍潭及常州電力廠被炸的一天），從此街頭巷面就時常聽到對於「下蛋」的推測和逃避方法，「租界中心總不會下蛋的！」「跑馬廳，新橋總會（敵司令部）附近總有些危險」，「法租界較爲安全，沒有目標」，欣欣然惴惴然；不久警局下令玻璃窗上需糊

紙條，沿馬路的玻璃櫺窗上就競爭花巧，各色各式的糊法，平白地給予技機者一種新的生意經，所謂「窗飾設計家」就勃興了。這是又一例。

總之，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愛國的熱情與編安的心理相矛盾着，而對非常時期的警惕與發國難財的僥倖却又同樣存在着。

上海的讀物，除了「中央書報社」所發行者純屬敵偽宣傳品外（如「文友」，這類書籍售價特廉，但極少讀者），可以說大都是牟利的；定期刊物中如「雜誌」「萬象」，三日期報如「海報」「力報」，其內容當然以迎合讀者心理為原則。「雜誌」「萬象」都號稱綜合性

雜誌，但所刊載的都是些風花雪月，張資平型的小說，絕對沒有國際論文，政治批判的文字；可是有一種顯而易見的普遍現象，每一種刊物每一期裏必有有關重慶的文字，例如「山城剪影」「重慶來鴻」等的小文，究其內容無關宏旨，不過說些南北溫泉的風景，甚至於是「寄鴻者」的個人日記，乾燥無實質。「雜誌」每期必有「文化報道」，其中四分之三的報道必是前三四個月的重慶，桂林，昆明等處的文藝界短訊。「萬象」更妙，時常轉載田漢，郭沫若，施蛰存等作家的舊文章，編者陳蝶衣特地從前十幾年的舊書裏尋出來，或者從帶出去的報章雜誌中揀選出來的，當然都是些純文藝研究性的文字。「海報」刊載「巫峽人物錄」一個多月，所記的都是重慶志上的人物，或者是從明人筆記中轉譯成白話文的，並無現代的名人。總之，這類的文字絕對不是趣味性的，與同一刊物上其他文字絕對不相稱，然而編者一定編排在特殊引人注意的篇幅中，誇大的標題。據說，這是「生意眼」，非此不足表示此刊物尚有重慶氣味，此刊物的編者仍倦念着重慶。

「蜀山劍俠傳」當然風行一時，連續出至三十幾集而不結束。

然而上海也真的有一有心人「賠本辦刊物，設法在字裏行間，啓示抗戰中國的偉大和現狀，或者激發抗戰愛國的精神，那當然是用盡心計的，因為既要逃避敵偽檢查的難關，又要達到讀者的眼中心中。這一類文字大概用兩種方式寫成，在上海也時常可以看到的。一種是在補白的地方，抄錄四書五經或名人筆記裏的忠君愛國的成句，或者是痛罵投降者無恥的短文。一種是用間接的意義來表白，例如，文字的表面上痛罵美國空軍在桂林的霍揮無度，影響人民的一般生活，實際上却襯托出盟機在抗戰的後方的確有了強大的威力。（本段恕不列舉實例）

讀物的內容固然可相當推測一般的心理，戲劇的題材收效自然更大。自從英美影片絕跡於上海之後，話劇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現在已經有了八個劇場專門上演話劇。

上海發生了一個奇蹟，我記不起準確的日期，大概是在去年十二月初旬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奇蹟

這是「青年日報社」主催的（偽組織下有「青少年團」，其性質是模仿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爲「和運」的下級幹部，「青年日報」便是此團的機關報），有電影明星參加主演（上海電影從業員一律加入敵偽合組的「中華聯合電影公司」的），在卡爾登戲院，上演「岳飛」的一齣話劇。

這當然是根據岳飛故事而編排的劇本，人物當然有岳飛，有秦檜。最精彩的一幕是這樣的：（我記不清原台詞，大概有下列的句子）

秦檜獨白：「天下無不和的戰事……我真奇怪我的主張，跟金國講和，竟沒有人贊同的，甚至於我

的鴉頭也反對我，我所親信的人都反對我……其實宋與金決不會戰爭下去的，終有和平的一天，爲什麼不趁此機會說和平呢！……我們應該同甘共苦……與金國共存共榮……」

正在高唱「同甘共苦」，「共存共榮」的時候，台下有些觀衆將茶碗茶壺擲上台去，那位扮演秦檜的角色仍舊繼續着背誦汪逆兆銘的演說詞，四座怒喊着「滾下去」……

幕下後，滿座春雷似的掌聲。

「岳飛」共上演七天七夜，場場滿座，家傳戶曉；到第七天被敵憲兵所禁演，「青年日報」亦因之停辦，「青年日報社社長」被逮，導演受懲戒，演員等沒有什麼處分。

據說，此戲門票每天可售十三萬元（爲當時最高紀錄），七天約達百萬元，佈景道具等成本約爲三四十萬元，化去「特別費」三十萬元，尙贏餘二三十萬元云。更據其內幕者談，售票處絕對不售票於日本人，化了「特別費」就失了險，廣告上說是上演十天，原定計劃也只預備七天，台詞與送檢劇本不符，台下擲茶碗茶壺者均是幕內人，用以增加戲劇的刺激性的。目的是賺錢，居然公然辱侮「主席」（汪逆），不能不說是淪陷區中的奇蹟之一吧！

自從「岳飛」的計劃成功以後，話劇界就盛行着同一類的刺激性的劇本，「文天祥」在蘭心戲院（地稅可說是相當冷落）上演，前後連演三個多月，甚至於燈火管制也不受影響，上座之盛可以想見。

「上旅」劇團因上演「雷雨」而虧了本，唐槐秋只得撥出「連環計」，內中有呂布在王司徒的府內歎血誓盟，高喊「打倒董卓」的場面，也可連賣滿座。

總之，話劇界有了這樣的風氣，只要是古裝劇，內中有口號，有亢慨激昂的場面，加以載歌載舞的

串插，便可以提高票價（三十三年元旦起，此類古裝話劇的票價爲一百元），而連賣滿座。至於戲劇的真藝術一概置之不理。類如「連環計」中之呂布，忽而英武，忽而馴從，忽而色迷迷向貂蟬大做其媚眼，醜態不出，忽而氣昂昂對王允演說忠君愛民的本意，光芒萬丈，簡直莫名其妙，毫無個性。

話劇界有了「岳飛」之後，不久出版界就產生了第二奇蹟，那就是我在本書開首介紹過的周逆幼海所著的「日本概觀」。

第二個奇蹟

「日本概觀」一書，三十三年二月八日出版，上海新生命社印行，計一四八頁，都八萬餘言，除本書九四頁外，其餘爲「附錄」，計短文七篇，茲抄錄其中的一篇「與日本友人談話錄」全文，列后：（讀者請記牢，這是在淪陷區出版的，而我所抄錄的是全文，隻字未改，標點及括弧以內的文字俱是原文。）

四 與日本友人談話錄

我在這裏，將平日與日本友人一些談話寫下來，這都是我認爲有寫下來的價值的。認識一個國家，有四種方法：第一是深深的參加他們的生活，第二是與他們做痛快的公正的談話，第三是讀他們的書，第四則爲自己思索。我毫不加入自己的感想與批評的寫下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會心的人一定領略得到，而可多少認識一點日本。

對於日本友人的姓名，我是隱瞞着，我也沒有徵求他們的同意，我深深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及友情

甲（一位紳士，當我這次一到東京後）：「你這次不會再跑回去了吧？」

我：（微笑，沒有回答他，這是我對日本友人，在一種不知怎樣回答時的一個非常笨拙的方法。）

乙（從上海到日本）：「在用功嗎？不用功不行的，你父親會生氣的！」

我：「不想用功時，我無法用功！」

乙（在他喝了一點酒後）：「想愛人嗎？如果想，我替你從上海帶來！」

我：「你頗了解青年人的心理。」

甲：「非常對不起，東京生活很苦，但是。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點頭）

丙（大學教授）：「最要緊的還是和日本學生在一起！」

我：「我也這樣想，不在一起，不能知道日本青年的思想與心理。就算雙方有意見不合的地方，何以辯論。」

丙：「意見不合，是沒有辦法的事。」

丁（大學生）：「你知道『日本精神』嗎。」

我：「我知道有『日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才是『日本精神』。安岡正篤氏在日本精神通義上說：日本精神不是文字語言可以說明的，你能將你的意思說給我聽嗎？」

丁（想了一想）：「我也知道有『日本精神』，但是我也說不出，正如安岡正篤氏說的，是文字語言不能說明的。」

我：「比如阿茲島的兩千勇士之死，就能代表『日本精神』，是嗎？」

丁：「正是這樣！」

我：「但是中國這種事也有，比如，不知道你知道，揚州十月的史可法，而西洋這種爲國犧牲的事，也是有的，比如 Tennyson 在『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中頌歌的事，這是人類的精神，不能說僅是日本的精神。」

丁：「也許日本多點。」

我：「也許日本多點，但是，如果你們不能明明白白解釋給我們聽，一個外國人，頂多除了知道有『日本精神』外，怎麼能了解『日本精神』？」

甲：「中國有着廣大的土地，多數的人民，豐富的資源，要成功一個近代的國家是很容易的，但是，就缺少一樣……」

我：「努力！」

甲：（連忙點頭）。

甲：「日本人做什麼都是非常嚴肅的。」

我：「是的，需要嚴肅時嚴肅，不需要嚴肅時也嚴肅。」

甲：「正是這樣。」

我：「但是，中國人却不需要嚴肅時不嚴肅，需要嚴肅時也不嚴肅。兩者相較，在目前這樣時代，我甯取前者。」

戊（一位日本太太）：「中國的太太們都比先生們神氣嗎？」

我：「不見得，不過比日本太太們對日本先生們要神氣些。」

甲：「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佳的民族，爲人家做事時，會拚命做而忘記了自己。比如現在在滿洲國做事的日本人，往往爲了滿洲國的事，而和日本人吵架。」

丙：「英美對中國的辦法是 Give and take--」

我：「那麼，日本現在是 Take and give--」

甲：「中日事變的起因，是中國不肯與我們經濟合作，更抵制日貨，當然我們也有不對的地方，不

「假使當時不那『抗日』，一切也不會這樣了。」

我：「假使真正的經濟合作，那我們當然願意的，不過，在當時，我們以為你們有領土野心。」

甲：「不，我們絕對沒有領土野心，我們就要你們購買我們的生產品，就滿足了。」

我：（無言）

甲：（無言）

我：「過去的事不談吧。」

甲：「過去的事不談吧，我們從此以後，同甘共苦。」

甲，乙，丙，丁，戊（當然不是同時的）：「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就是中國菜了！」

姑且到這裏為止。

我將這篇文章給邵洵美讀，洵美讀了之後說：「語堂見之，當自歎不如也！」（林語堂編「論語」時，邵洵美是老闆也，）

「日本概觀」全書的精神也是如此；不論對敵國的任何一點都存着蔑視（例如對日本的憲法，「日本精神」，國民性等）和諷刺（例如：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日本的文化等）；有時且有警惕我國人士的寓意（例如在「日本的社會」一章內），而對偽府官吏簡直是謾罵了。周迺之所以寫這樣一本書，也許是做奴才者的「不平鳴」，然而這本書可以使我們明瞭些應該知道的關於敵人的一切，和够表示這是偽區中的另一奇蹟。

五、敵僞之間

「人相愛，狗相嚙；狗鬥時洒之以水便自解。」

——應劭 風俗通

我猜，一定有讀者要向我提出質問：難道漢奸也具有心肝的麼？那班爲虎作倀的在淪陷區魚肉民衆的又是誰呢？

來回答上述的質問，我採取一個取巧的方式，那就是用敵人筆下所描寫的漢奸的行爲，漢奸的心理——我又得抄錄吉田東祐的話了。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申報」社論，標題「兩種親日派」，其中有如是妙句：

第二種親日派

「第二種親日派，開頭就有着易於成爲所謂漢奸的素質。他們多少懂得一點日本話，又進而製造和日本人接觸的機會，由此結成特殊關係，趁着戰局混亂，任意爲非作惡。有的利用官廳的名義捕人，勒索鉅款，有的操縱金融市場，掠奪良民的積蓄；總之，凡威脅，敲詐，殺人等非法之事，無所不爲。和平區域的人民，對於榨取民脂民膏，積有幾千百萬財富的那些漢奸之流，都是贈以憎恨的目光的。」

「又以阿諛接近日本人，投日本人之所好，餽贈禮物，獲得其他中國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權而飽私囊的，也是第二種親日派。」

「第二種親日派，是沒有國家觀念的猶太式的存在。在他們眼裏，沒有中國，也沒有日本。有的，無非是自己的利害關係。……知道國積是破壞人民的生活，使國家的財政瀕於危瀕的，自己却首先實行國積，想阻礙取締。一面明知鴉片和賭博是有關國家興亡的萬惡之事，一面還是暗中企圖存在下去。」

「第二種親日派是漢奸。」

這樣痛罵漢奸的文字，我想，在重慶發表，也不過如此（吉田東祐的文字，倘若全文照抄，就會有極引誘性的毒素了；我雖然是犯了斷章摘句的毛病，但他確是這樣下筆的。）；其實，不但吉田東祐的行文，時常以這類引誘性的詞句，來吸引上海市民的注意，「申報」上的社評，可以說有着一貫的作風，對南京偽府的一切，予以不斷的抨擊，簡直不顧偽府的「體面」，使南京「當局」啼笑皆非，去年（三十三年）一月下旬，「申報」與「中華日報」的筆戰，更為顯著。

申報對抗 中華日報

「申報」現為陳逆彬蘇所把持（陳逆彬蘇以寫「蔣介石論」博得敵人的「青眼」，作進身之階），不啻是敵大使館的喉舌。「中華日報」為偽府之機關報，所謂「官方」代表人也。此兩報之筆戰恰足以顯示敵偽之間的矛盾。

這次「筆戰」是因為上海物價飛漲而引起的，最力是「申報」寫了一篇「社評」，批評上海的物價飛漲之不合理，大意大概如此：

「上海租界交還之後，上海的物價竟突然飛漲了……（當然舉了不少的例）……我們都似乎聽到重慶的物價飛漲……我們却以為重慶的物價飛漲尚有可原諒之處，蓋重慶的附近，土地貧瘠，物資缺乏，生產機構不够健全，交通運輸又屬簡陋幼稚，更因近來重慶人口之突然增加，供需不相稱，故物價不得

不騰貴……和平區佔沿海各地，爲我國富庶之區，上海又工廠林立，生產所在地，上海的人口亦未見過於擁擠，而物價竟如是飛漲，若委罪於交通不便，試問交通何以不便？若歸咎於市民囤積居奇，試問囤積居奇究竟誰是始作俑者！……總之，政治之不上軌道，官吏之不够清廉……實是物價飛漲的內在原因……」

等語；這一來可引起「中華日報」的難堪了，因爲「申報」不僅直接責罵南京偽府，而且以「重慶」爲「噱」間接諷刺；於是，胡逆蘭成就寫了一篇「勝利第一」爲標題的星期論文，刊載於「中華日報」，大意是：

「值茲大東亞戰事緊急關頭！我們應該以戰事的勝利爲第一要圖……整頓吏治尙屬次要步驟……現在竟然有人不顧念我們幾經艱危，進行和運的以往歷史，而妄加指摘……有損國府威信……那簡直是淪方的第五縱隊……」

等語，這些話在偽區中看來，雖然是厚着面皮講話，却是用足「高帽子」的了。但「申報」並不因之氣餒，且不肯就此甘休，照樣的反駁過來，翌日社評的標題是「革新第一」，可謂針鋒相對。大意是「……勝利固屬要圖，但此次戰爭爲長時期之戰爭，長期戰事非有善良之政治爲基礎，決難求得勝利……故欲求勝利，應以革新爲第一……高唱勝利，不務革新，又何異於捨本逐末……」

此是大略，實際上，你來我往，長論短評，總有七八篇文章是互相謾罵的。

后大 椿案

又如盜賣軍米的「后大椿案」。

后逆大椿在前年任爲「江蘇糧食管理局」局長之職。據說，在任期內，將從鄉民處強徵得來的米糧（其中一部當是「軍」糧），私運上海，以黑市價格出賣，約在前年年杪，突被敵憲兵所截獲，當先將后逆及該局副局長胡逆政等逮捕，並經刑審得實，於是將后胡兩「解送南京，交偽府核辦，此事頗予汪逆以難堪，但也沒有辦法，偽府方面特地爲了此案組織「特別法庭」，公開審理，當經判決兩逆死刑。據說舞弊數額達一萬萬七千萬之鉅。

「申報」却於這時候寫社評，先說明此案之破獲並非偽府自動澈查，有意懲辦貪污，而是「友邦」憲兵的「仗義行爲」（這種情形，在「申報」未公開發表前，一般人民，除了消息靈通者外，還以爲真的是偽府整頓吏治呢！）；繼之，則謂「僅僅槍決兩個糧食局長，不足肅清貪污」，並且直接指謫偽糧食部必與此案有關，「區區一個江蘇糧食局長何敢如此胆大妄爲……查后大椿爲糧食部長顧寶衡之內姪，蛛絲馬跡，不難推測……」等語，淋漓盡致。

這一來，偽行政院竟不得不有「糧食部長撤職」之議決案，後來甚至根本取銷「糧食部」，「該部事宜歸併於實業部」云云，可謂滑天下之大稽。（寫稿時讀中央社屯溪電訊，此案且株連敵員三十人，其中槍決者三名，其餘押解返國，顧逆判徒刑十五年，糧食部次長周逆乃文亦判無期徒刑。陳逆璧君受賄四千萬元亦莫能爲力，具見敵方脅迫偽方之甚矣。）

「上海市市政府秘書，耿逆續之（嘉基）爲陳逆親信，隨之自殺。據說，日人方面因耿逆自殺後，才無法再尋根究底，否則連陳逆公博也許要牽涉在內的。（據確訊，耿逆接敵憲兵部電話，請其前去問

話，乃於當晚畏罪自殺。實際上，敵偽之間的矛盾並不如是「客氣」，這裏且舉兩個實例：

一樁是徐逆英（世光）口述的，徐逆現爲丁逆默村之部下，任「社會福利部科長」「全國體育協會總幹事」等偽職，他說：

日憲兵被殲

「在南京，到中山陵去的城門口，從前有八個日本憲兵把守的，不論任何人經過那裏，必帶脫帽致敬，如口含香烟，尤需立即拋棄，否則雖特任官吏，亦必勒令停車，步行出城。南京有幾位長官會遭遇這一種恥辱，中央稅警團的團部某長官也是其中之一，中警部隊可就不客氣了，在某一個清晨，暗地裏約齊了三四十個兄弟，搥了兩挺輕機槍，突然的開到那城門口，劈劈拍拍，就將八個日本憲兵全數解決了，一個也不騰，事後由內中的兩個自動的向日憲兵部投案，直認爲本人所爲，日憲兵部也無可如何，只得將兩兵移交中警部隊團本部，由其本團予以懲辦」云云。

一樁是我親眼目睹的，那是在甯波發生的。一家越劇戲院門口，據說，該戲院由偽第十師「撐腰」，突然發生「和平軍」與敵憲兵的爭執。該院每場照例送票給敵憲兵部二十張，那天有敵憲兵三人不持贈券，而擬強入觀戲，把守門口的偽第十師的兵士就予制止，繼則動武，其中之一（敵憲兵）即逃歸本部，旋即糾集十餘人前來，且手持步槍，但偽第十師等見其一人逃歸時，亦即通知「師部」，竟在戲院門口設置機槍，一時人心惶惶，交通斷絕，幸敵憲兵部長官一看形勢，立即制止部下行動，未致擴大，該長官且有訓誡其部下之不當模樣，了却此項公案。

這種事並非偶然的，相類的事亦不止這兩次，可能的會再發生的。推測其心理，那些偽軍自以爲生

命已是重拾來的（他們大都是游擊隊出身，經敵軍包圍而被迫投降，改編為偽軍的），死何足惜，他們甚至於說這話：「我們當和平軍，已遭萬人唾罵，不過是混一口飯吃，再要受矮子們的烏氣，可不來的！」；而敵方面呢，則以為「小不忍則亂大謀」，投鼠終需忌器，只求甯人息事，既非大規模的「反動」，也就算了，況且事態一擴大，將來更難收拾，姑且得過且過罷了。

李逆士羣死因

他們對於李逆士羣，就採取不客氣的態度了。據李逆的親信者談，李逆的確是被日人所害的，李逆的家屬敢怒不敢言罷了。李逆致死的病症是惡性瘧疾兼烈性傷寒，據醫生說，李逆的身內同時有此兩種病菌，實在無法醫治（治瘧疾之藥恰足以助長傷寒病菌，而治傷寒之藥又足以助長瘧疾之病菌——大概是這兩種症候，我雖一時記憶不清，但著學原理則一，是可斷言）。大概是日人在宴請李逆時（有人說是咖啡內），暗置此兩種病菌，李逆於得病後兩星期始畢命，敵用心惡毒，於此可見。一面復製造空氣，說係熊逆劍東所為。（熊逆為偽中央稅警團團長，平時與李逆不睦）

李逆致死之由，「申報」揭為不服從「中央」命令（李逆死後，「申報」有社評痛斥之，認為死有餘辜，亦屬「怪論」）；按之實際，李逆一人獨兼偽江蘇省省長，偽清鄉管理局局長，及偽特工隊總隊長等要職，手下餘黨衆多，潛勢力尤大，夜郎自大，遂為敵人所忌。事後，敵方面亦不否認：當李逆絕命之際，敵方會派一師團兵力駐紮蘇州，以防李逆部下「叛變」云。

李逆死後，江蘇省由陳逆羣接任偽省長，「清鄉管理局」及「中央統制局」即於無形中停頓。

果然 畢命的 汪逆

寫到這裏，一定有人要問：「汪逆究竟怎樣了？」

我的回答是「還沒有死」(屬稿時已料定：本書刊出時汪逆必已畢命了)；敵人對於汪逆之死亡，無陰諱之必要，而且敵人心目中，最好有一個「還沒有死而等於死的」汪逆存在着，據內幕中人說，真明是這樣的：

去年初，汪逆的彈創發炎，痛楚非凡，有一個日本醫生自告奮勇，經診斷後，認為可以開割，經開割後，一度似痛楚驟減(此事曾在偽區各報刊載，彷彿還對「友邦」良醫感謝呢!)，但不久即變本加厲，昏絕兩次，原來是槍彈發鏽，已延及肋骨，肺部亦已受傷，開割時，雖將子彈鉗出，並不能醫療已經受毒之肋骨及肺部，終於重新發炎，現已用飛機運至東京醫治，據云，汪逆已半身不遂，不能動彈，等於活受罪而已。(據悉，那實施開割的日本醫生已切腹自殺)

敵駐偽大使谷正之對於偽府主席之繼任人選，頗屬意於王逆克敏，曾於汪逆半身不遂之軀體運日之前，向汪逆提出警告，囑其先行發表王逆克敏之偽行政院院長職，但汪逆堅決拒絕，終以陳逆公博及周逆佛海分別代理偽國府主席，偽行政院院長，偽國防會議主席等職。(此事亦經各報發表)而汪逆死後，果由陳逆任「代主席」，其所以不「扶正」者，「主子」心中猶不十分樂意也。

總之，敵人方面對於偽府官吏，不求其能否做事，但求「聽話」，譬如汪逆必死未死，身在東京，凡欲逼迫偽府施行何種政策，即可以「主席交議」交偽行政會議，議決，通過，發表，實施；又如偽上海市秘書長一職，本為趙逆尊嶽，但敵方猶嫌其善於活動，借故挑剔，乃改由「書獃」吳逆頌皋充任，可能的是將來的偽上海市市長。敵方的目的是所製造出來的偽府官吏，不求其幹練有為，惟求文縹縹的

肯就範的。傀儡的本質本來應該如是！

上海計有七張大報。「申報」「新聞報」是一個系統的，陳道彬蘇遜有全權，受敵大使官的蔽護；「新申」是敵軍部的喉舌；「中華日報」是偽宣傳部的官方報紙；「平報」由金逆雄白任社長，周逆佛海的傳聲筒；「新中國報」是邵逆式軍所獨力支持的！「國民新報」本屬李逆士羣的機關報，現由黃逆敬齋任社長，背後撐腰者尙在物色中。英文報兩張都在敵人手中，俄文報一張也受敵人津貼。敵偽之間的矛盾，時常可從各報社評中看到。

敵人爲了「新政策」，想沽名釣譽，所以陽善陰毒；漢奸則求各保其「位」，但求利祿；兩者之間的聯繫，不是「香檳」，便是「脅迫」，目的不同，當然各自爲政了。敵人可比「困獸猶鬥」，奸偽抱着「苟延殘喘」，兩不爲謀，毫無「共存」可言者也。至於敵敵之間，僞僞之中，更是奇形怪狀，寡廉鮮恥的了。

六、魔影幢幢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

——五代史雜傳序

「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污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警，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罵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屠羞以爲祖，不亦惑哉！」

——方孝孺·謹行篇

據說，陳逆公博在不久之前，對「和運份子」，曾有過如是的獨白：

「我們在香港動身的時候，我們是有組織的，我們是想做一番給人家看看的；但是，一到了上海南京之後，各人做各人的官，毫無紀律可言，管又無從管起，約束更不必談，真不成樣子！」（他本人固然未見得何等清高）

慨乎言之矣。陳逆公博與周逆佛海是偽府中比較的拿得出來的兩個東西。他對於偽府的「同僚」的所作所爲，也只會搖頭，而慨乎言之矣。陳逆尚且作如是獨白，就可想像得到淪陷區的人民所受到的荼毒了。

當上海租界「交還」之後幾天，汪逆會來上海，據說，有一天，在大馬路上一家鋪子裏親自買了一雙皮鞋，詢問價格，那家鞋店老闆明知道是汪逆，就忍痛回答着「每雙八十六元」，汪逆屈指一算，「戰前約爲十一二元一雙，現在只漲了七八倍，還不算貴！」（可說厚臉之至）。其實這時候，上海買一雙皮鞋已經要一千五六百元（現在達數萬元）了，汪逆之昏矇竟如是，這就可想像得到「公館派」（陳逆璧君之流）的妄作妄爲，還非汪逆本身所得而知，而敵人之樂於利用汪逆爲傀儡，於此又得一證矣。基於上述的兩樁事實，就可證明從淪陷區傳來的種種類如「神話」的敵偽醜態，並非「神話」，而是絕對的事實。現在，我來講述幾樁我所目睹的在這一年中發生的小事：

共舞 台事 件

租界接收未到一月，愛多亞路上共舞台門口就發生了「和平軍」與「上海市警察」火併的活劇。據說，起因是「和平軍」看白戲，共舞台老闆張逆善琨乃通知「捕房」（應該是「第八區」——嵩山路的警察局），捕房乃加派武裝警察，前往彈壓，將「和平軍」兩名拘捕，於是「和平軍」方面乃大起問罪之師，一路由南陽橋入租界，一路由十六舖從外灘開入，各路均以卡車兩輛爲單位，上架輕機槍，在共舞台門首會集，不問情由，即開槍掃射，初則警察方面猶開手槍抵抗，終因火力懸殊，自動繳械，「和平軍」於解決共舞台門首之警崗後，並衝至警局，將被逮之「和平軍」放出，始耀武揚威地開回南市，當時租界上立即下緊急戒嚴令，交通斷絕（自下午一時起訖至五時），警署下令逮捕「和平軍」，形勢十分緊張，而當「和平軍」由租界開回南市時，經過南陽橋，當地警崗已將鐵絲網攔住，「和平軍」喊開民衆，復以機槍掃射，將警崗如數解決，拆開鐵絲網，揚長歸去，傍晚，因發現在租界其他區域又有「和平軍」被捕情事，當向「市政府」交涉「勝利」後，復

在愛多亞路游行示威。

是役也，「租界」警察死者十七名（內俄警四名），傷者八人（報上刊載較此數為少），共舞台因之停演五天，皇后戲院（亦為張逆善琨所主持）亦停演三天。警察撫卹金陳逆公博出十萬元（其餘大概由張逆善琨負擔）並由陳逆召集警察訓話一次。

肇禍的「和平軍」為偽中央稅警團，實力為各偽軍之冠，日人亦為之側目。此次結果僅將駐滬長官該團副團長羅逆君強調任安徽偽保安處處長了事。

這樁公案發生時，上海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事後，一般市民相率稱快，以為「這班作孽多端的警察早該橫死！」

上海的警察

上海的警察，「巡捕」的化身，可以說是無惡不作，且舉一例：

靜安寺路底一張烟紙店，有一天來了兩個警察，上門說要買兩包大前門香烟，那時已中午了，那店家就很客氣的回答：「今天的限價烟已經確實賣完了，對不住得很，請你明天來，一定替你預留十包。」（大前門為上海最高貴之限價烟，所謂限價烟者是每天由「軍管理」的烟草組合配給各烟紙店的，數量是限定的，價格也是限定的，上海就專有一批人，於每天清晨排班擠在烟紙店門口，買進這類廉價的香烟，然後再在馬路上以黑市價兜賣，這種行為叫做「軋派烟」。而警察之流的特殊階級人物照例可以不「軋」而按照限價買烟的；所以，那店家作如是委曲婉轉的說辭。

那警察却說：「好，有還是沒有，賣還是不賣，明天不必說！」那店家回答他：「今天委實沒有了。」警察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十時模樣，先來了兩個便衣人，撞進那烟紙店的後面堆貨的地方，將身邊攜來的一瓶火油倒些在舊紙堆裏，用火柴一點，竟放起火來，拔脚就跑，同時店門口不到一二分鐘就來了一架救火車，除了救火員外，上面就有昨天來買香烟的兩「位」警察，一進門就嚷着「你們放火！」，彷彿他是未卜先知的。

這家烟紙店有一個老司務（即僱工），精明老練，當最先兩人去放火的時候，他就看清來路不明，跟他們進去，他們一走，他就將火種熄滅，匿藏起來，不露痕跡。

那店家一瞧形勢，就知道是尋上門來的，雖然沒有被他們拿到「放火」的證據，却也打躬作揖，說了許多好話，損失了二三十包大前門香烟，才算把那兩位警察請走了。據救火車上的救火員說：「今天上午，這一家已是第三家了。」（原來，上海自施行「保甲制」以來，敵人對「放火」一案異常重視；所以，倘若這一家烟紙店果真起火，而被警察捉住火種，財產的損失固然要百倍於二三十包香烟，店家還有那當入獄的無妄之災呢！）

陳逆公博有鑒於此（當然不是此樁事情，蓋指類於此種事情的情形，傳入於其耳者當亦不鮮），乃有「模範警察」的設置。「模範警察」的服裝要整潔得多，據說，月俸較平常警察高出三四十倍（原有警察的月俸，據說，仍與從前相仿，僅百餘元，而「模範」者則三四千元云）。從此，就可想像得到，偽市府的主管人員也承認原有警察是「不模範」的了。

上海本身不出來的，除戶口米由地方配給外，大部的食米都由四鄉的鄉民肩挑背負來賣的，當他們從鄉區踏入市區的關口，必受站崗警察的勒索，據說，凡是這一種「要衝」所在地，每一個警察月入之豐可達七八萬元之鉅。賣菜蔬的，賣柴的等等小販也遭遇同樣的命運，這也是造成上海的米珠薪桂的現狀之原因之一。

陳逆羣就任偽江蘇省長之後，上海的二等流氓謝逆保生（綽號「辣保生」者也）竟被委任為一保安處處長，三等流氓張逆松濤（一向是靠舞場謀生的）做起「公安局局長」來，於是從前附逆於何逆世保而漏網的狐羣狗黨都到蘇州去做「督察」「巡官」了。似乎會一度「繁榮」過的蘇州，又從「天堂」翻到「地獄」了。偽區內地方官吏任用之濫，於此可見一般。

吳淞的查緝處

邵逆式軍，不知道是什麼動機，組織了一個「聯誼」足球隊，為豢養足球員起見，在吳淞及江灣設「財政部稅務署查緝處」。我與這班球員大都是熟悉的，到過吳淞去觀光一次。那真是怪現象之一。

那些球員根本不懂稅務，他們多少有些流氓成份（不是說他們每個如此），他們又要錢去養活本人及家眷。所以，他們就佈「散兵綫」於車站（昔稱「吳淞鎮」，現稱「南吳淞」，原有之蘆漢濱改為「北吳淞」），大橋（介乎吳淞鎮與蘆漢濱之間）以及公路大道的「口子」上，遇有鄉人攜有什物者就叫他們停下，予以搜查，不論其應該納稅與否，都說：「這不可以的」於是，鄉人為懼怕什物被沒收，②避免麻煩起見，都繳出五元，十元以至百元，千元的「賣路錢」來。他們也從來不給予任何稅單或收據的；而淪陷區的「順民」也就有「過了一關」的概念而過去了。

這個「查緝處」最大的收入的來源是黃浦江，黃浦江上的帆船便是他們掘金之所在。他們僱了一隻舢板，插上一面「旗」，就在黃浦江裏挨着船隻勒索，查到香烟，紗布等（統稅所及）當然名正言順，可以逼付巨額稅款或沒收貨物，就是漁船，也不是順手牽羊攫取鮮魚多條，便危言恫嚇，促其繳納賄賂，始得相安無事。每一艘船就非數百元莫辦，不論是剛從海外開來的，抑是從上海開出去的，只要在吳淞停泊一下就需繳納這筆「稅」款。

總之，「查緝處」每天可以收入三四千元（最低限度）而偽稅務署絕對不徵收分文，一概歸球員們分攤。號稱提倡體育的偽稅務署長邵逆式軍竟是這樣「養」球員的，你道怪也不怪！

同化了 日人

我只述些最瑣屑的情形，我認爲這正可以反映出淪陷區人民所受到的偽府官吏荼毒的實情和偽府官吏的人品卑鄙拙劣的實況。

至於敵人方面呢，可說是一丘之貉。周幼海還擔心「日本人多和中國人接觸，會染上不好的習慣」；我却說：他們已被偽府官吏所同「化」了。

上海的「太王市長」渡正監之所以保庇張某（張某之胡法胡行已詳第三章），據說，是爲了一個女人。張某物色到一個尤物，叫做「蘭君」，一度下海爲舞女，頗有豔名，頗長的身段，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說相當雋媚。那敵酋因身居要職，不敢公然在外獵豔，張某最初還以「名門閨秀」相介紹，那存不入彀之理。張某就因有了這一層內線關係，有恃無恐。渡正監掌握整個上海的生殺之權，尙且如此。毋怪，我的家鄉，一個敵海軍管轄區，每一個敵官員都有「姨太太」了。

若說，日本人不好色，於此恰得一反證。

在上海，糖是最感缺乏的食品之一。豆腐漿攤上就沒有甜的出賣。到去年四月，糖價已達每斤一百六十元，而且不容易買到。可是市上兜賣糖的搨客還是有，據說，賣出者都是日人。他們都是從「軍管理」中偷運出來的。上海買糖的條件十分慎重，計有：①需送到，②要有三種「護照」（一為搬運證，二為貯藏證，三為出賣證）；因為，事實上，時常發生上午才買進五十包糖，下午敵憲兵又來抄了去的情形。同時，賣出者亦有條件，一要受主是糖食店（否則他就沒有辦法向軍部請領護照），二為護照有效期間最多不過三個月，三每次成交要在一百包以上，（每斤一百六十元，每包約為一百五六十斤，一百包就達二百五六十萬元之譜），少了他就犯不上做這筆交易。這就可想像得到日本人要錢的狠心了。

事實上，煤，西藥，大批的建築材料都只有日人出賣的。

「興亞大廈」（原為「百老匯大廈」）的房間大部份是「中日合作」的，在這一種裝璜最新（遠非國際飯店可比）的，設備最週的（去冬猶有水汀），可以說是目下上海最佳的大規模的公寓裏，任何違禁物品的交易都可順利進行。

若說：日本人不要錢，我不信也。

六大茶室

倘若有人要問：上海最興盛的是什麼？異口同聲的答詞是「賭」，賭的公開和賭的繁榮，那簡直是整劃上海的象徵，不，簡直是整個偽區的象徵——敵人，偽官，順民都存着孤注一擲的僥倖性在苟延着殘喘呢！

「同慶」，「西園」，「綠寶」，「華民」，「大生」，「永安」等六大「茶室」，自三十一年夏季至三十三年三月底，可說是盛極一時，其獲利之豐，生意之佳，在任何其他經營之上。三十二年年底

，「同慶」的股東，每股（二千元一股）分得官紅利八萬元。「茶室」裏每一個職員所得的「大衣錢」（其實就是小帳，賭者於贏錢時擲交賭台上職員的紅錢）每月平均在萬元以上，就可想像一切。

那些「茶室」規模之大，更是駭人聽聞。每日所付車資達二三十萬元（去賭錢者不論遠近，其來往車力概歸「茶室」支付），飲食單子達六七十萬元（其廚房每次採辦魚肉蝦蟹必登報投標），冬有水汀（去年上海煤斤缺乏，雖高貴旅館如國際華懋亦無水汀），夏生電氣，通宵達旦，盡享享受（上海人說：要吃得好，非到南市賭台去不可）；牌九，番攤，輪盤，骰子各種各樣的賭博俱有，每一個「茶室」總有二三十號台子，男女招呼，每「室」在二三百人之譜，至於賭額之大，可以一事爲例：

有一家小銀行，因紗布吃跌，頭寸即感缺乏，該銀行經理異想天開，乃以本銀行本票，向各「茶室」兌現，以應付頭寸，例如於星期一傍晚，攜星期二期本票向各「茶室」賭台上先兌換籌碼，各賭台無不予以方便（事實上，星期二期頭的本票需於星期三中午始兌現，故該經理可借用款項一天半），稍事週旋，即以籌碼兌現，攜鈔而返；如是者日積月累，至該銀行倒閉之日（該銀行終因股票影響而倒閉），六大「茶室」共計收受不能兌現之該行本票達八百萬元之鉅。後來，由黃逆金榮出來講斤頭，以半數了帳，賭場老闆也就算了。

陳逆公博未就任「市長」之前，曾以「禁賭」爲口號，但上台之後迄未實行，據「同慶」茶室老闆夏士魁說：「他們也不想一想，當滬西賭台禁閉以後，南市毫無市面，若不是我們的六家滲淡經營，南市那有現在的繁榮，況且南市的公安局緝私隊的經費也完全由我們公攤。就以現在而言，同慶一家每天捐給慈善事業的款子總在二萬元以上，每天我到同慶去，檯上的捐簿總是一大堆。至於靠我們六家過日

子的，最低限度總有好幾千人呢！黃包車夫，地痞，小押舖，警察……」。他所說的的確都是事實。（上海的捐款名目繁多，其中黑幕重重，而漢奸當中最沒有出息的丁逆默却就轉到這念頭上，在去年年初，特地組織一個「社會福利事業籌募委員會」，把上海的「名流」一網打盡，那無異是捐款的統制機構，不顧廉恥如是，可歎也。）

三十二年九月間，六家合送陳逆一千二百萬元（據說，收受此項賄賂者為陳逆的老婆），三十三年一月又送二千四百萬元，到三月底，「茶室」終算壽終正寢。

據說，到了三十二年年底，那幾位賭場老闆都已面團團腹便便，賭場繼續開不開，倒已不在乎此；所以仍舊繼續「營業」者是從業員的要求，和偽上海市南市公安局局長盧逆英的主意（他個人可從六家賭場每天獲得十二萬元的保險費故耳）。

青少年運動

而所以終於關閉的原因，並非偽市府的堅持原議，却還是由於「青少年團」的「打倒烟賭舞，除三害運動」所致。更澈底的講來，是林逆柏生對陳逆公博的「吃醋」與「示威」的行爲而已。

據說，禁娼，禁舞的運動發源於東京，敵人鑒於西南太平洋戰事形勢日非，國內民氣日見頹唐，乃下令禁娼禁舞。上海的虹口首先響應，兩家藝妓的娼寮自動焚燬；偽都南京也跟着有禁舞的運動。林逆柏生眼看陳逆做「市長」進益甚好，就利用「青少年團」來搗亂一下。（按，「青少年團」本來由陳逆任正團長，林逆為副，但實權却在林逆手裏）突然間上海市上就有了成千的學生，以日人主辦的同文書院學生為前導，在跑馬廳集合後，即向各舞場，賭場，娼寮，烟窟進攻。第一天是「文」的

由各「團員」到各處登台演說，予舞客，賭客，嫖客，及烟鬼以「訓導」及「警告」；第二天就實行「全武行」了，持斧刀棒棍等武器，撞入各處，搗毀招牌，賭具，烟具，樂器及倚桌等設備，並將當場捉牢之烟鬼（一摩登女太太）游行示衆，看來相當認真，警察及賭場烟館舞廳的撐柱等均莫敢攔其鋒。

事實上，各賭場均於事前接得警署的通知，早爲準備，損失有限。當「青少年團」出發時，警署且派員派車沿途保護（其實同時也是監視），故到西藏路時，靜安寺路一帶的舞場便照樣整理開門，六大「茶室」午間被搗，傍晚也照常營業，結果則是：①平時與警局方面關係較淺者相當倒霉，②，六大茶室孝敬林逆一千二百萬元，③茶舞取消，④娛樂捐從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四十而已。

鴉片的價格反因之激漲，燕子窠照樣開燈，戒烟所仍然公開設立，據說，「烟」的背後有「盛老三」，爲「天皇御弟」，絕對不受絲毫影響。（從上海人的口中說來，上海有四隻獅子，喻其財富之巨，首席卽爲盛逆，次爲卽逆式軍，三爲周逆佛海，四爲李逆士羣；到現在，那最小的「獅子」已服法了，其他三隻的命運恐怕也不過曇花一現而已吧！）

賭，在表面上，似乎是暫時「禁」了；當筆者離滬時，盧逆英已派人向各賭場老闆接洽，並已宴請各大小報記者一次，擬以「地方建設協會聯誼社」的方式死灰復燃。那「理論」是：「聯誼社」中可設「俱樂部」，「俱樂部」當然以「賭」爲消遣，以「俱樂部」的收入謀「地方建設」，匪夷所思，誠可謂「上海之大，無奇不有」矣。況且「六大茶室」一停歇，「上海體育會」的賽馬，「逸園」的跑狗，「中央運動場」的回力球，生意就一躍千丈，「觀」衆擁擠不堪了。

日本號稱「禁賭」的國家，但賽馬爲法律所許。在上海的日本人不許到跑狗場回力球場去賭錢，敵

憲兵可就地逮捕；但跑馬廳裏的會員間，現在都給「友邦」人士占滿了。跑馬廳改組爲「上海體育會」，實權也握於日籍董事的手裏了。

跑狗場，本來每星期有四天賽狗，據說，此後將改爲六天了。

回力球場已從西班牙人歸華人自辦，變成合法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總額竟達一萬萬五千萬元之鉅，股票的市價還看漲呢！

至於各大旅館內的「台子」（小型賭場，如牌九，羅宋牌九，沙蟹等）藉警局「翻譯」（包探已失去時代性了）爲護符，更遍地皆是。

上海是賭的世界！

魔影幢幢，罄竹難書！

七、我的被「傳」

「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

——蔡子英上明太祖書

在我未追述「我的被傳」的一頁小史以前，我得先述明「被傳」之前所處理的情形——在我去年從桂林動身赴滬之前，我已決定了怎樣應付類如這樣一種的「邀請」時的一切；因為我曉得我之去上海多少有一些危險性，雖然這一種危險未必會影響到我的生命。自抗戰軍興的前一年，我就投身於新聞界。在上海，漢口，香港以及桂林，一向寫着抗日的文字的我當然是一樁可驚疑的事——於遠東戰事發生後的一年半我突然回到敵偽核心的上海去——這在敵偽看來是如此，就是我的親友們也作如是的直感覺（第四章中已述過實例）；我本人當然早已想到這一層。

三十年十一月初旬，「一二·八」的前一個月，我因某種任務溜到上海去過一次。那時候公共租界多少還是英美的勢力。我在香港未動身就先預定了由滬返港的船票，一有朕兆，便準備立刻逃回香港。那一次，在上海過了十二天的「老鼠式」的生活，除了必須見面的朋友敍敍之外，對外是守某種程度的秘密的，後來因為半夜裏來看我的同業們日漸多了，一溜烟就上船了。有許多朋友還以為我沒有去過上海，也有許多朋友等我離開了上海以後才曉得我到過上海。

這一次去上海，預定的逗留日期最短是半年，甚至一年或二年，上述的方式是絕對的不能再採用了，我改變了方式。

我認定：以往我對敵偽有的是「公仇」，並沒有「私仇」；這般做漢奸的人們對私仇是以牙還牙，有仇必報；公仇倒未必緊記在心頭的，却有私交可講。

所以，我在甯波啓程到上海之前兩天，就先拍電百樂門旅社，預定房間。百樂門，在「七十六號」橫行時代，彷彿是滬西幫薈集之處，因之也成爲南京偽府官吏旅滬的「行宮」。我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們的當中，表示坦白。

到滬的一天就去逸函看足球比賽，當然碰到了不少從前熟識的體育界中人物，現在忙着粉飾太平的人們，並且告訴他們：「我今天才從內地到此！」，也是表示坦白。

於是，體育界的「新人物」認我是體育界的老前輩，也有請我吃飯，請我寫「文章」的，我都來者不拒，一一應酬，寫些重慶，昆明，桂林及曲江的體育界近訊，更表示坦白。

從這種場合中，輾轉介紹，我就認識了那一批目下在上海化錢「玩體育」的新貴人，新富翁們，類如丁逆默邨，邵逆式軍，潘逆三省，陳逆東白，夏士魁等。潘逆似乎對我最有好感，有意思請我去做他的「三省體育會」的總幹事，時相過從。

潘逆是「聯易銀行」總經理。在公共租界存在時期內，「聯易」是第一家商業銀行推行「儲蓄券」的；所以，他雖然沒有做偽官，却與偽府首要及敵方軍政聲息相通，頗有「交情」，爲上海金融界巨頭之一。

我之所以敘述這些，因為這是我被「傳」後，終於「旋即釋放」的轉捩點的主要因素呢。

其次，我又不得不一述兩位為國殉職的烈士。

他們都是粵籍華僑，大的叫做「傑美」，生長在檀香山；小的叫「史丹萊」，從小住在香港。他們倆姓霍，是從兄弟，在英國軍事代表團服務，這次才從加爾各答，銜命赴滬工作。

這是在浙閩交界處，從浦城到龍泉的公路上，十一二個人搭着一輛運鹽的空車，說着笑着。傑美打着硬腔的普通話，叫司機「開得快些！」，跟着說了許多嫌他們的開車技術幼稚。我忍不住了，就用英語（因為他們倆彼此之間是用英語對白的）對他說：「只有幾十公里的路程了，午飯總可在龍泉吃的，車子載重太輕，公路又不平坦，過於快了易於肇禍。你不應該在司機的旁邊高聲談話！」

頤長英雋的傑美，彷彿認為我的話是老成持重者說，「O.K.你是對的」，純粹的美國語調。我們從此就結了伴。史丹萊，短小善睡，江浙話一句也不會，接近游擊區時，他就裝成啞子，在甯台一帶，廣東人是少見的。當時，他們告訴我，是到溫州去的；我也這樣說，「同路的」。凡是由西南到淪陷區的人們，在溫州之前，必說「到溫州去」，到了溫州之後，則說「到甯海去」，那簡直是千篇一律的「謊話」。

在龍泉，恰在霖雨之後，甌江水勢陡漲，船隻極少，我們打聽着有一隻運軍需到碧湖去的小船，翌晨開旋，他們就自告奮勇，「我們有辦法！」

第二天清晨，我們都到了船埠，傑美一人到×××集團軍辦事處去交涉，他勝利了，船上就騰出艙位來，讓我們，占一席之地。

我們更廝熟了，傑美才廿六歲；我當然比較的年長些，他們都叫我「POP」；那又是一種十足美國味的稱呼，他們倆的父親都過世了，他們就歡喜這樣叫我。

過了碧湖，軍需都搬清了，這條船是我們的了，江面又續漸開闊，夜裏我們就到了永嘉。

「我們又獲得了文明，我們得狂歡一宵！」傑美高聲地說；的確，我們在船行的兩天內，三餐都簡陋得很。我們不聽船家的支配，麗水青田我們都不停，我們餓了才叫船家靠岸，找小村莊買飯，想吃飯的時候又非鄉人進餐的時間，豬肉，雞蛋也難得有的。

在華大利，我們吃到了梅蛤，珠蛤，蠶蝦，黃魚；史丹萊對海味沒有胃口，他囓着點白切鷄，排骨，火腿。我們也喝着酒，黃酒和永嘉著名的酒汗。因到埠的時間太晚，我們開不到房間，我們就睡在大菜桌上。

喝了酒當然興奮些，又因過了不少天的「原始生活」復享受着「物質文明」，又要喝汽水，外加冰淇淋，我們之間是無話不談了。

「半年前，那就是去年年底，我們在上海過耶誕夜，這次我們既到了溫州，我們倒想再到上海去，溫一溫舊夢；史丹萊，明天不妨去試一試看，也許可以請一個月的假！」傑美說——他對於工作的步驟，可以說，是嚴肅的，這時候對我還保守着秘密，怕小史喝了酒後說出到上海去工作的話，所以這樣掩飾着。

「無論如何，我們得在溫州休息幾天！」當我說出我也預備再往東行之後。

溫州是號稱「東方的威尼斯」，夜裏我們便在湖裏划着船，白晝或洗浴，或散步公園，我們就這樣在永嘉歡敘了三天，他們也「請准了假」，復一同上道。

離永嘉後的當天晚上，我們在虹橋（離樂清縣治三十里的一個村鎮）過宵，天色已黑了，細雨霏霏，傑美說，「這裏有一個天主堂，我跟這位美國神父尚有一面之緣，這裏的客棧又髒，小船上又無法安睡，我們不如到他那裏去！」於是，由船夫領路，摩挲着到那聳着十字架的教堂，敲門，敲了半響的門，才有了回音。

「父親（這一個詞是英文的）在家麼？」傑美向開門的教友說。「他已經起身了，就要出來了！」他回答着。果然，穿着黑長袍的「父親」來了，他才三十幾歲，客氣得很，讓我們進去，並且替我們預備了每人一碗湯麵，才甜蜜地入睡。

那位神父來虹橋已八年了，他能說浙江話，美國話倒說得很慢，他說：「我的英語快忘記了，在這裏八年，這還是第三次遇到用英語談話的機會呢！」他說了後笑起來了，素常對天主教不甚抱好感的我不禁肅然起敬了。這裏不容易看到英文的報章雜誌，他問了我們好些關於抗戰情形的話。

「有許多我們（美國）的兄弟已經來中國作戰，這話可是真的？」他的天真誠摯的確表現他還年青呢。

傑美以圓潤的美國語調，簡扼而又委婉地作答——他雖然更年青，却有相當涵養，保持着「人子」的禮貌，我開始對他理解了。小史就遠不及他，斷句的香港式英語，有時還隔雜廣東音。

過溫嶺，黃岩，或船，或步行，我們說得更多，他說：「去年，我們也是走這一條路到上海，回來則從舟山漂海到福州，在上海住了二十天，日本人一些也不知道」；他告訴我，半年前，他們是完成「工作」而返的，所以，這次又奉命到上海去。

「廣東人走這條路是相當惹人注目的，不危險嗎？」我說。

「難道阿拉的甯波話還不好麼？（的確，他能說幾句）史丹萊，我就不許他開口，到了上海後，那是廣東人的世界，汪精衛，陳公博都不是廣東人嗎？滬西的公安局兵潘達還是我的親戚呢！我們的市民證，上海的市民證，也是他替我們弄來的。」

「真姓名麼？」

「不，假的，到了甯波，我就不姓霍了，我姓董，我還有一個丈人在上海呢！」
他們是不顧一切的，而他够勇敢的。他明知道敵人的獵狗滿布於「孔道」上，他却坦然自若的，樂天的，爲工作和使命而前進。

第三天的傍晚，到了海門，毫無猶豫考慮的時間，我們趕着跳上了引擎已發動的小汽船，天已陰沉，據船上說，上水要五六小時才到臨海呢。那條航線一向是擁擠的，我們當然找不到艙位，我們就在甲板上席地而坐，以爲談談笑笑，也會到達目的地的。船似乎特別開得慢，天漆黑了，下雨了，起初，我們把傘作擋雨的防禦物；後來，雨傾瀉下來，而且有斜風，傘失去了功效，顧了前便不能顧後，甲板上全都濕了，我們不能再坐了，氣候也變涼了，口裏渴，肚裏餓，「飢寒交迫」我開始理會到這一短句的意境了。我們不得不再行動了，找到了「大副室」，推門進去，裏面早已擠滿了人，本來已是一間很小的

「室」，而大副又得掌舵，看上去，再擠一個人還勉強有辦法，兩個就難了。

他們一定讓我去躲一下；而他們繼續着和風雨奮鬥。

到臨海已十一時，好在天倒晴了？他們似乎已經忘記剛才的處境，當我們在客棧裏寫登記簿的時候

於是，我曉得：他們也够能耐苦的，富於毅力的。

在珠吞，我們從對面的旅客的口中探得：西塾方面（奉化與甯海交界處，我游擊隊伍×部的駐紮地）前二天會有「小接觸」；我們便決計放棄長轎到白杜的原是計劃，取道橋頭胡（在甯海之東三十里，有海道可通奉化之吳家埠）。

到橋頭胡已晚七時許，海邊尚有「航船」一艘未開，可是太擠了：我們一行七人，跳了下去。「這不能開的，最少下去十個人！」船老大高喊着；的確，那船上的載重量是過份了的，還是帶着纜的，船上已有些東歪西斜了。我們終於退了下來，就眼看着那條僅有的「航船」拋了我們，揚帆入海了。

在橋頭胡過一夜，似更有些不情願，不但要遲到甯波兩天，而且這地方的客棧又髒又潮濕，「三寶」（臭虫，蚊子，跳蚤）俱全，我正在盤算着：那怎末辦呢？！

「這裏有一條空船！」小史的聲音，他在香港海關服務過，對於「走私」一道有相當警覺性；於是，我就過去跟那船家講船價了，我們單獨的包這條船。起初，他說不去，我就慫恿他說一個價錢。

「八百元」，他說。

「好，就是八百，那末，就要開的。」傑美搶着回答。我也正在盤算：在途中多耽擱兩天，我們所

耗費的決不祇此數呢，雖然這一個船價是太貴了些。

孰知那船家以爲我們是喫公事飯的，傑美過於爽直的回答啓了他的疑心，恐怕到了目的地不給錢，竟堅決的表示：「不去，我們這裏還有事呢！」說完了這句話，竟揚長的跳落船向鎮上走去。

傑美氣極了，也就向大家說：「我們不管，我們答應了他的價錢，他那有不去之理，我們又不會少他的錢；好在現在我們再也找不到客棧，我們上船吧！」

最後一句話說得最有誘惑性，於是，我們全體動員，將行李什物都搬上了船，最後甚至於將鋪蓋打開，鋪在艙面上。

我們佔有了這一條船。

船上還有一個小夥計，到這時候，他只得跟我們說好話了，他自願上岸去找船家回來——我們也忘記了我們的行徑與海盜何異呢！

這次，傑美又是勝利的。翌日清晨，我們安抵了吳家埠，且較「航船」爲早。

他們是富於冒險精神的。總之，他們的本能足以担承他們的工作；所缺少的，他們還不够了解我們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因爲他們究竟是華僑。而就因爲這一種缺憾終於造成他們倆的「壯志未遂」的結果。

我到了甯波，因設法「旅行證」多住了一個星期，他們在到甬後第二天就動身赴滬。

當我到了上海，傑美首先來看我，同來的除小史外，還有一位黑頭髮的俄國人，「這位是陶克，我的好朋友，POP，我預備在一二星期內到北平去一次，他的（指着陶克）父親就在那邊蘇聯領事館做

事，他可以替我設法通行證」。

潘逆達已下了「野」，他們失去了「靠山」；而從偽華中區到偽冀察區是要向敵人方面請領「通行證」才行的，所以，他們不得不求教於陶克了。我已開始爲他們倆擔憂。

兩星期後，傑美叫小史來看我，借兩千元，說是「匯款尙未收到」。

這更奇怪，因爲匯款應該比他們早到上海的，我更爲他們着急了。

第二天，我去看傑美，問他：「匯款怎麼沒有到，這當中怕有毛病麼？」

「POP，你有錢，先借些我化一化，日本人不能奈何我們什麼的，就是被他們檢了去，我也不會忘記我的職務，死有什麼可怕呢！」

怕又隔了三四個星期，我知道傑美的境况更爲窘迫，匯款始終不到；於是，終於發生了下面的一會事。

十月，某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還酣睡着，突然被基推醒了，他板着面孔說：「有東洋人來看你！」

接着那位東洋人就立在我的床前，我相信我够鎮定的，連忙起了身，披上晨袍，「對不起，請坐一會……」

「你可認得這兩個人？」他竟不讓我講下去，就站在我的身傍，伸着左手，手掌上攤着一張白紙，

紙上寫着「董××董××」六個字，我記不起那其餘的四個字，好在那是無關緊要的。

我點一下頭，「認得！」

「他們已經被捕了，請你去問幾句話！」口氣似乎還客氣。

「好的，能否讓我洗一下臉？」我早已認定這一去原不是簡單輕易的事，然而我不得不借這「過門」來思索一下。

他俯允了，他就站在盥洗室的門口近窗處。

我跟基（他是我的一個外甥，與王逆克敏有些親戚關係）合租的百樂門二〇八號室，外面一間會客室相當寬大，一半闢作辦公室，除了寫字桌外，有一隻長沙發，兩隻單人沙發，四五隻靠背椅；裏面一間則是一半臥室，一半客室，再裏面則是盥洗室。

當我洗過臉，穿好衣服，走到外面一間的時候，我吃驚了，我開始意識到「形勢」的嚴重了，原來那些沙發和椅子上都坐滿着人，不少陌生的面孔，大部是「友邦人士」，而且都是便服的。其中兩位就伴我下樓，上車，用汽油的汽車，靜安寺路上少見的。一位開車，一位陪着我談話；他們都遞着我名片，於是，我才認得：開車的叫齋藤真，「特高科」主任，談話的叫佐伯信一，那時候也在「特高科」，後來就榮任「新聞檢查處科長」。這兩位，後來與我時常往來，所以，我能記憶得他們的姓名。

後來，據百樂門的帳房對我說，那天早晨的情形。五個東洋人一進來，先拿出刊着「特高科」的名片後，就要查住客登記簿，查了一遍，說，「不對，還有客人不登簿子的麼？」帳房間他要查什麼人，他却不肯講，只是要查簿子，帳房也沒有辦法，只得將旅客自己所寫的登記紙，及每一間房間的分戶帳

都給他們查，足足化了半小時的時間才查到了我。原來我初到上海的時候，開的是二〇六號室，傑美領着陶克來過的，兩星期後，我搬到二〇八號室了。

從這一點，我認爲：敵人的特務工作者是精細的，防備週到的，但疑心病重，動作未免迂緩的。

齋藤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做特工的，濃眉，光頭，留着脣上鬚髥，談話時有聚精會神的眼光直射着對方，和一雙動作輕微的脣皮，吐着低而尖銳的問詞。佐伯則完全兩樣，頹長的身段，頭髮修亮，西裝也穿得講究，談吐更委婉有禮。

談話，最初是用上海話的，立刻就發現他的上海話有日本頓挫，而我的則有甯波口音，都不容易叫對方了解；後來，改用英文對白，變方便利得多；這一層對於我當然更便宜，暢所欲言，有時還趁勢改正他的發音。

佐伯說：「你不過有嫌疑而已，到了那邊再說」，當我詢問我之被請的理由時。我也就知道在車子上，多說無益。他隨便又問我些似乎無關緊要的問題，類如，何日到上海，現在做什麼事，上海可有朋友親戚，等等；我也用最簡單的答詞敷衍他。

汽車直開進威海衛路（同孚路口）上一所龐大的「公館」的鐵門，門口並無什麼招牌，經過了草地，停在大廈門口，踏上石階，經過走廊，在後面的一所廳堂裏，我瞥眼看見陶克，跟一個日本人笑着談話。

「狗！」我不禁在心中罵着。

這所房子大概是南潯邱寓的變相。他領我到了前面的客廳裏，原有客廳把板壁隔成了四間辦公室，

最前面的一間是齋藤的辦公室。

他們指着沙發，我就坐了下來，齋藤就很隨便的問我：「你們本來認識的麼？」

「不，我在到上海來的途中偶然碰到他們的」；接着我就追述那會在鹽車上的事。

他似乎聽到不耐煩了，「你到上海來有什麼事呢？」

「上海是我生長的地方，這裏都是我的親戚朋友」。

「好，你且將你所能記憶的怎樣認識那兩位董先生的事用中文寫下來」，接着他就叫人給我鋼筆，

墨水和一張白紙。

「噲，你姓陳，陳先生，你的房間可以讓我去抄一抄麼？」突然的他擲過來這樣一個問句。

「當然，可以」，我相信我沒有選擇別的答詞的自由。

在我動手寫那張「供狀」的時候，我發現向也同時破「傳」了。向是我從桂林啓程時的一個同伴，

我們是同鄉。他剛從學校裏出來，對於他這次可說是無妄之災。

我踏進這所神祕性的「特高科總機關」時，約爲上午九時半，從這時候起，一直到十二時半，除了化一刻鐘的功夫寫成那張書面供詞之外，其他的時間簡直是「乏善可陳」；然而我所嗅覺的氣味是惡劣的，形勢似乎對我不利，因爲既沒有一個人專責的來審問我，却突然的過來一個人對我問了二三句就走了，或者忽然又走近來，另一個人也問了二三句而走開了，總有三四次，我也記不清了。大部份的時間是坐着呆等，人家也不理我。

這地方辦公的人並不多，而且看上去，以流動性居多，忽而進，忽而出。

他們對我的態度也不一律。有一個危言恫嚇地說：「那兩個姓董的是軍事要犯，你的罪名也不輕，有人告你是重慶份子。你在上海認識什麼人？」

「潘三省，聯易銀行的總經理，陳東白，社會福利部駐滬辦事處處長」，我想起這兩位，也許是萬一的救星。

「潘生，你們是朋友麼？」他顯然不甚重視了逆獸郵屬下的走狗，雖然陳逆東白新近才榮任「處長」的。

他也不再問下去，走開了。

有一個中國人，也不知是何居心，於問過我一些經過情形和身世之後，却說：「你不過是嫌疑罷了，無關緊要。」

「那末，你想，我今天可以回去麼？」

「我想，你可以。」

「出去要保人麼？」

「那總要的。」

「現在已十一時了，今天又是星期日，吃中飯以前打電話去找人還有辦法，到了下半年，那就難了，可否讓我先打一個電話？」

怪得很，他對我看了一眼，走開了；彷彿，這事與他無關，而我問得太過份了，有些不識相。

十二時半，齋藤又出現了，「餓麼？」這倒給他提醒了，整個的上半年我還沒有進過食，對這樣一

個問題，當然點了一下頭。

「每人兩碗肉麵」，他關照了一個侍役後，又走開了。過了五分鐘，他給我到另一間房間裏，這房裏有兩張長方的書桌及四五隻椅子外，無其他什物，也沒有人；其中的一張書桌上，赫然攤着一堆零星的文件和照片，我一望而知，這都是從我的房間裏抄出來的。觸目驚心的是我寫好而沒有寄出的一封信。

我並不擔憂這封信的本身，這封信讀起來是一封情書，本來就是我預備有這末的一天——敵人突如其來的抄查一下；這是寫滿四張信紙，濃郁的談戀愛的文字，慫恿一位尙留在桂林的膩友快些到上海來，俾得重敘舊好，潔白的玉版牋，秀麗的書法，人家看了應該不至於再起疑心裏面還有什麼的。而我的心怦然了，因為在這四張信紙的裏面還夾着一張小方的便條，那是季被押於敵憲兵司令部的報告，如何被敵人的爪牙非刑拷打的密陳的草稿。我還沒有謄清，也還沒有「寄」出。我原把這封信與我的支票簿放在一起，銷在一隻壁櫥的抽斗裏，鑰匙猶在我的身邊，旅館中的茶房並沒有這鑰匙的：當初我以爲我有十足辯白我的身份的說詞；倘若他們將這來質問我，我將何詞自遁呢？季被押六個星期，化了不少錢，才釋放出來，現在正是「改過時期」，想到季，那更糟了，豈不是又要連累他了！我的汗毛一根一根的豎起來了！

「放在那張桌上」，齋藤對持了兩碗肉麵進來的侍役說，我也只得坐在另一張空桌上，開始充饑。我沒有胃口，但我却知道非吃些東西不可，否則我將沒有精力來對付目前的處境；齋藤又走開了，這一間房間裏只有我一個人了，嘴裏嚼着麵，眼睛只是望着那隻信封。

陡然間靈機觸動，我迅速地吃完了一碗，就跑過去坐在那一張堆着文件的桌上，身體背着門口，手指敏捷地伸進那信封裏，觸着那張「密稿」，抽了出來，就塞在胸袋裏，對外面望了一望，沒有人影，再走過那張空桌子上，提起另一碗麵。

那簡直是神蹟似的，我也不知道我那裏來的聰穎和勇氣，居然手脚乾淨地這樣做了。

我的心穩定得多了，一面喫着麵湯，一面看着外面，沉寂得極，也看不見人影；於是，我將胸袋裏的「紙」，慢慢地塞進鞋底裏，我泰然了，我恢復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又過了一刻鐘，齋藤與佐伯，手裏拿着我所寫的「供狀」，走進來了；他們倆用日語講了一會，大概是審問的方針，佐伯到隔壁一間去審問，齋藤坐了下來，開始審問我了。

他一面問，一面扎記（當然是用日文的）；每隔了一刻鐘，佐伯過來一會，商量一下，對權一會，繼續審問。他不但三翻四復的盤問，我與權的關係，而且將我的身世，從抗戰以前一直到這次到上海來的原因為止，都不厭其詳的扎記下來。我抱定：我的回答要比他的問句來得更為迅速，和他問一句我就回答兩句，類如他問：「你知道權是一個軍事機關中人麼？」我就回答：「我知道他是與軍事機關有關罷了，他根本不肯講給我聽他的任務，在中國，仗着認識幾個軍界中人也可有特殊勢力的，他們連中國字也不認得，我不敢確定他們是服務中國軍界的，所以，我不能預先來密報！」

「有人告你，你與重慶方面的軍政要人有往來」，他問。

「我不是已經說過，我在新聞界服務已有十年了，相當有虛名的，一個有名的新聞記者怎能不熟識軍政要人呢？！與軍政要人往來根本便是我的職務。我想日本的新聞記者也是這樣的。」

一直問到三時半，他終於說：「你要明白你所犯的嫌疑是異常重大，這裏我給你看，這是霍的軍事通行證（赫然是蓋着××委員會關防的證明書），這是溫州方面來的情報（上面有着霍氏兄弟的姓名，第三名便是陳復雨——兩個別字——第四名只有一個「向」字，名字却沒有的，下面還有兩個空擋，我們從溫州動身時的確有六個人在一起），這裏（當然他是指上海）也有人告你。現在你可以回去；但你得明白我們是特別寬恕你的了，你是一個新聞記者，你應該曉得很多，這次我幫你的忙，下次你也要幫我的忙！」

我也只得點一下頭。

「你得去找一個保人來，任何怎樣的保人，只要他認得你。」

「一家商店的經理，行麼？」

「可以！」

於是，我拿起電話打給一家商店，那經理不在家，一個小夥計聽電話的，「經理不在，只有一個小夥計，今天是星期日」，我望着齋藤說。「也行，叫他來就是了，不，叫他到四馬路總巡捕房，六樓，六〇四號房」。

我照樣的向那小夥計述了一遍，接着，我便同他們（連向也在內）乘着汽車，到「六〇四」號房去。那小夥計來了，我寫了一張「決不突然離滬」的「志願書」，保證人下面由那小夥計蓋了章。那家商店的書東圖章。

「不要對任何人說，你到過威海衛路的一所房子的，你只說被人家拖累，捕房請你去問了兩句」，齋籐最後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

◇ ◇ ◇ ◇ ◇
我回到白樂門，我發現那隻抽斗是被掘開的；基告訴我，他被監視到下午一時，才恢復自由，房間裏其他的人也受到同樣的待遇。

潘迺三省，第二天，告訴我：「昨日吃中飯的時候，我的茶房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你們那裏可有一位叫陳某某的，那茶房也沒有問過我，就平直的回答：有的，這裏老闆請他辦理球隊的。」

於是，我才恍然大悟，「特高科」的態度下午與上午截然不同的主因。

後來，齋籐還來看我過三次，佐伯一同吃過兩次飯；這次，我離滬之前，我去看佐伯，說：「上海的生活我沒有方法再過下去，太貴了，我想回到家鄉去，可以麼？」

「可以，不成問題」你到了你的家鄉後寫封信來！」

「那末，請你轉告齋籐先生一聲！」

八、上海的衣食住行

「哀哉流民！爲鬼非鬼，爲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無縵袍，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刈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盡行絕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言辭不忍聽，號哭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莫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滿路，生者與鬼鄰。」

——張養浩，哀流民操。

「所有的是金錢的道德，金錢的社會秩序。金錢的所有者是道德的決定者，也就是爲政者。他們怎樣造成今日的財產，此地也不想多說，在他們發財背後，不知有幾千個破產者在街頭奄奄待斃，也不知有幾萬個善良的農夫爲了高利貸而被剝奪了土地。然而，他們却是這社會上所謂模範的紳士，昂首闊步。這種紳士最近迄未絕跡。二三年之前，尙是街頭「癮三」，曾幾何時，已積聚了數千萬的財產，他們之中，甚至有莫名其妙其正業爲何者。然而人們對其財產的來源，恬不爲異，祇當他們是「發財老爺」而待以紳士之禮。在這種道德中，賭博被認爲高尚的娛樂，賭博的場所當然也成爲紳士的俱樂部。在戰時經濟下，一般的家庭都在節約電氣，街頭上自晚上八時左右起，燈火均已暗滅，工廠亦因節約電力而被迫縮短工作，然而這些俱樂部却能够徹夜通明的點着煌煌電燈而「通宵營業」。在這種道德中，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雖競事囤積，鴉片更做了高官，兵昏迷迷而審理案件，人們都不敢責怪。」

。這又是吉田東祐的話（見其論文集第三十八頁），可作為上海現狀的縮影，淋漓盡致。在我未縷述上海的一般生活之前，先給讀者一個概觀。

「物價騰貴，是目前上海嚴重的社會問題，所謂投機的囤積居奇，已不只是商人的營利行爲，是上海市民爲了生活而取的非常手段。」（見吉田東祐論文集第四〇頁）

「在全上海，不，在整個的和平區域內……還想活著做人，就非跟着囤些貨不可。甚麼公衆福利、道德，國家，社會安全，良心，都可以管他媽的，否則你就休想過活，做人。」（見三十二年四月十日「新中國報」專論「打擊投機的緊急對策」）

「如此，因爲上海市民搜購物資的結果，墮入了物價騰貴——儲備券購買力低落——物價更騰貴，儲備券購買力更低落，這一「惡循環」公式，民衆自己抬高了物價，却自己爲其後患而苦惱。」（見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申報」社評）

這些又是眼看到上海的一般情形，經過敵偽檢查機構而公開發表的文字，可以說是上海生活着的人們的自我觀察的印象。

在大後方的人們想來，「衣」在上海總比較的是不成問題的；不，上海自從「棉紗統制」後，買布已不是一樁輕易的事。布只許由布店出賣，綢緞店就不許賣布；而買布者只許買本人

所必需的尺寸，多就犯法。倘若你從布店裏買了你和你的家屬所需要的布，簡單言之，八尺布可做旗袍，一丈四尺可做長衫，而你買了二丈四尺約布，在馬路上走路的話，警察就可干涉，將布充公。而「棉紗統制」以後，大量的紗布既歸敵人強搶了去以後，民間（商家包抄在內）的存布量更數有限。

物以稀爲貴，布價那有不騰貴之理，陰丹士林布在上海早已買到一百元一尺（三十三年五月份，永嘉的市價每疋亦僅一萬元），在去年年底，一件最粗劣的布棉袍子已需二千元以上。所以，「穿」的問題，在上海，也是嚴重的。

呢絨更不必說，價格騰貴的速度比大後方要快好幾倍，一套普通好洋裝，在三十二年十月份約爲五六千元，三十三年三月份已是一萬元開外。上海根本沒有毛織品的製造能力了。

也許還有人以爲「這不見得吧！」，我們不妨再從另一種角度來觀察上海的服飾問題。

上海，彷彿有「東方的巴黎」的雅稱；我相信：現在還有人（那當然是「淑女們」）憧憬着「今年上海不知行什麼式樣？」

倘若這一個問題由我來回答，則是：「去年時行的是工人裝，今年也一定是工人裝。」

那是「時勢」造成的。汽車沒有了汽油，就不能在馬路上行駛（我敢一百分的一百確定，現在上海大馬路上的汽車較重慶民族路上來得少），擠電車（決不是「乘電車」或「搭電車」）決非踩着高跟鞋者所能爲力，於是，女學生（時裝發明者之一），女職員，以及洋女人都騎着自行車代步（這的確是這一個時代「偉大」的造就，好在馬路上既少有「市虎」的橫行，婦女們騎自行車並不感到怎樣困難。），騎自行車當然以「工人裝」爲最合式。倘若任何一個人有許多年沒有回到上海去過，到了上海，最使他感到特殊的就是滿街的自行車和車上穿着紅紅綠綠的「工人裝」的「淑女」們。

上海的舞女，在近十年來彷彿居着「時裝」的主要發明者的地位；到了現在，她們似乎已對此灰心了。前年（三十二年）的耶誕夜，我嘗到各舞場去巡禮過。按諸向例，在這一個晚上，每一個舞女都穿

上新裝。但我所目視到的，成百的舞女中僅僅偶然有二三個能做到這一層，大部還是穿着前一夜的旗袍，因為在她們的盤算下，這一夜的收入決不能抵償一雙新絲襪的買價，何能因這一夜而特製新皮鞋，新旗袍呢！她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她們的收入決不讓她們從事於「奇裝異服」了。這當然也因為「奇裝異服」的成本太貴了而造成的現象。

實際上，因燈火管制，因交通不便，上海已根本沒有「時裝」了；而做一件新衣裳的代價太貴，上海人也不得不放棄講究服飾的惡習了。

食

我已經敘述過，上海點心店的蜂起（見第三章）和豆腐漿攤頭上沒有甜豆腐漿賣（見第六章）的情形，顯示上海人已吃不起「館子」，而糖的缺乏已如是尖銳化了。實際上，在上海，主要食品都昂貴的。食米每石的價格，在這一年中，從二千元躍到六千五百元，所謂「戶口米」又永遠不會做到合理的分配。油和糖都感到異常缺乏；而最使上海的居民感到痛苦的是燃料的缺乏，把米變成飯，冷水變成沸水的必需品。上海人習慣上主要的燃料是煤球，煤球應該是配給物資之一，但因為煤的來源的枯竭，所謂「配給煤球」竟形同具文的了。在前年年底，買煤球簡直與「覓寶」一樣的難，黑市價漲到六百元一担，同時柴的價格漲到十元一斤。據一個主婦對我說：「我們家裏每一個月的開銷，食米的代價與燃料的代價相等，假定在這一個月，米買五斗，化二千元，柴和煤球亦需化二千元。」煤球質料的窳劣更使主婦們頭痛，配給來的煤球時常是烟鹵裏的煤灰和泥土而成，有煤球之形而無煤球之實的。

「老虎灶」去泡冰，沖一碗茶需五元，洗浴挑一担水，約為六十元。（三十二年年底的價格）這似

乎是神話麼？！

住在重慶的人們也許要提出一種質問：「到上海，化錢總可一快朵頤了！」

我雖然不能給你一個簡單的「不」字，然而我却認爲「一快朵頤」也未必盡然。

「飯店裏沒有飯喫」在上海是現實的。日本人把「飲食店」分作「一等」，「二等」及「三等」。因爲食米的缺乏，他們就禁止一二等的餐館賣飯。上餐館喫飯，最後喫的決不是飯，而是麵或麵食。西餐館的菜單上也決沒有咖喇鷄飯，什景飯等等的項目。這，你可習慣麼？

「一年陳的蝦仁」，你也許對這一個短句而驚奇；在上海又是現實的。高等的餐館裏所預備的魚蝦都貯藏在冰箱裏，你決不能在「新華」「美華」「榮華」等最奢華的粵菜館裏喫到新鮮的鱈魚或蝦仁。試問，這可合你的胃口？

魚類是統制食品之一，上海歸「魚市場」獨家經營，沿海各城市則有「漁業組合」；所以，鮮魚就絕迹市場。何嘗不想「一快朵頤」的我，在過去的一年中，是感到異常失望的。設法想喫些新鮮的魚類，其困難並不亞於重慶，而價格之昂貴更甚。（豬肉，在三十二年四月杪，上海價是八十六元一斤，同一時期，在浙西一帶，僅廿五元至五十元，上饒最廉，龍泉最貴。）

江南沒有好的白酒，醇郁芬芳的茅台固然可以不必想，紹興酒也不會嘗到過可口的。實際上，紹興酒也決不能運到上海，到處都是本地釀製的黃酒而已。

怪得很，上海不能說是禁酒的區域，但餐館，酒店或任何公共場所，賣酒需在下午五時以後，提早賣酒便犯法的，不但司法人員可以干涉，「友邦人士」也會自動干涉的。而七時以後，街上已成漆黑一

國，試問，那裏還有雅興來喝酒呢！

咖啡，英美貨如奇珍異寶，上海製造的有一種叫EBC牌尚有咖啡味道，一般的售價是六十元一小壺。舞場裏，西餐館，所喝到的大致是炒米粉或黃豆炒焦後磨成粉的東西，喝而不知其味。

舞場裏的一盃清茶，代價是一百五十元。

以房屋的建築而言，較之大後方當然是舒適得多；然而跟從前相比，却也有天壤之別。到了冬天，缺少煤的關係，大廈之中就沒有水汀；平常的人家也生不起火爐，禦寒之道就遠不如

昔。豪華的旅館如「華懋」，「國際」等都如此。因為節電的關係，電梯的使用就有了限制。一般的方式是：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半，下午二時至三時，有上樓的電梯；下樓就非走不可，六七層固然如此，十幾層也是這樣。

已經有房子的，房租是便宜的，大房東固不許時常加租，二房東也不准過分勒索；但要想去租一幢房子或借一間公寓，那代價之昂就匪夷所思了。一上一下大概需頂費五十萬元（其中並無傢具），一間也要四五萬元。

電話，「一」（中央區）字頭的可值十四五萬元，「三」（西區）也可值七八萬元。事實上，電話時常不通順，線路不夠，不能隨心所欲的。

住旅館有許多門檻。價錢便宜的如國際飯店，單房間二百餘元，則需出頂費（約萬元）方住得着；房價低廉的如新旅社，孟淵旅社等，單房間約五六十元，但你所出的代價却仍在二百元之譜，因為習慣上，「小賬」兩倍於房錢；價錢貴的如百樂門，單房間約三四百元，比較的是最容易開得着的。

像我在上海是一個旅客，每月所付的房租就很可觀，房金每天三百元，加百分之十的捐稅，百分之十的小賬，電話每次二元，而房間裏的沙發，既陳舊多油漬（家家如此，「國際」亦相差不多，因為旅館老闆決沒有錢來裝璜這些傢具了），彈簧也有失去效力的，熱水籠頭形同虛設，盥室不能洗浴（無熱水）電燈闇黑如鬼火（枝光既有限制，復加以黑紅色的布罩，防燈光外露），到上海去住，還有什麼趣味麼？！

住家也未必舒服，入夜，一因永遠燈火管制，二因節省電力，窗上要蒙黑布幔，說句笑話，親友間的雀敘也受了限制，恐怕用電過度，而受剪斷電線的處罰。

查戶口的麻煩是兩道的，警察局是一個機關，憲兵司令部又是一個機關，前者比較媽虎些，後者不但要盤問身世，而且傾箱倒篋，纖微畢查。（憲兵查房間的日期總在「紀念日」的附近，如「七七」，「八一三」等，抄查的時間非深夜一二時，即清晨四五時，相當予旅客為難，但妙得很，旅館的賬房必於前一日通知旅客：「明晨四時憲兵查房間」，所謂查，固已失去查的功效而僅是麻煩而已）何況，長住在上海的人必需加入「自警團」，這是強迫的；雖然可以化錢叫人家代為站崗，但一經查出，麻煩也不少。

行

苦得很。電車公共汽車的路線固然縮短了，車輛也減少，而搶着要坐的人實在太多，因為代價是廉的，一二元到四五元。每一條馬路上，你會看見排着一字長蛇陣的「行列」，毫無疑問的是等車子。那是「大站」。「小站」就更妙了，電車或公共汽車停車的地方就不一定，或者不到停車站就停了，放下到站的搭客，擠上同等的人數就開了，因為開車員怕擠上來的人數過多無法

開車；有時則開過了停車站二十碼突然停了；所以，倘若你若在「小站」候車的話就等於跟電車捉迷藏，非脚下快身體強健者不必想乘電車或公共汽車。

三輪車黃包車的代價便形同敲竹槓。倘若你在一個下雨的夜裏，從北站下車，攜了一隻箱子，想叫黃包車到愛文義路馬霍路的話，那車夫所開出來的代價會叫你目瞪口呆，最少是一百元，時常是五百元。（平時應在三四十元之譜）

柏油馬路固無從修理（修馬路之成爲奇蹟應在意料之中，南京路——本來是紅木堆積的——已有許多地方鋪着小方的石塊），陰溝亦難得澆通，所以，上海一下雨，就有好幾條馬路成了河道，西區更多，坐黃包車過一條橫馬路，討價就是二十元。

在重慶，以爲住在上清寺的人難得到城區去是一樁憾事；現在的上海，住在東區的也難得到西區的了。假定從楊樹浦到靜安寺，乘電車就要排三次班，從楊樹浦到華德路（提籃橋），電車就終點了，你非得換車不可，從提籃橋到白渡橋又中斷了，因爲電車不過橋的，你就必需走過橋，向橋上的敵兵站崗脫帽致敬，在外灘再排班乘電車，這樣呢，所付的代價是在五元之內，但所費的時間是二小時半以上。倘若要縮短時間而乘三輪車或木炭汽車，代價便是二百元以上了。（現在的上海根本沒有了電車，不知上海人怎樣行呢！）

而「封鎖」又是時常遇到的情形。局部的封鎖，不必要遇到發生什麼「事變」的，就要實施的。有所謂「恐怖演習」，便是假定這一區內出了盜案，叫「自警團」練習捕盜的演習。有所謂「過路」，那是敵僞重要人物經過時避免行刺的防備，也照樣斷絕交通，封鎖起來。有時爲了查「市」證，也會突

然下令封鎖。

我在上海一年從來沒有聽見因封鎖或因演習而收獲什麼效果，但予居民的影響是「少出門」而已。所以，在上海，你倘若出門不隨身攜帶「市民證」是够危險的，因為隨時要遇到查「市民證」的場合。倘若在半小時前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你「我就來看你」，左等右等他還沒有來，不必驚奇，因為他在半途中遇到了「封鎖」。

搬家，那是一件更麻煩的事。人變換住址既然要向保甲處聲請，「市民證」需更換，戶口需重新登記，就是傢具的搬運也要請求「移動證」。這些都是化錢，費手續的事。

白晝行路已如是困難，一入黑夜，電車公共汽車，八時就逐漸進廠，十時半後就絕跡了，十一時後就變成「剝豬羅」的世界，除了幹路（如靜安寺路，福煦路，霞飛路）上還有行人外，上海是一個靜的「大地」了。

「上海難道沒有享受麼？」同樣的，我不能說沒有，不過我說，「上海人是苦中作享受？」樂，樂中找苦而已」。

宴會還是有的，譬如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就有許多朋友請我吃飯。奇怪得很，請客總是西餐多於中餐。後來，我當然明白了，請中餐實在太貴了；五千元一桌菜僅僅勉強可以請客，而實際所付的賬單可能接近萬元，因為外加酒錢，車馬費，而筵席捐是加二成，小賬加一成，小小賬再加一成。西餐呢，牛油是植物做的（「可的」牛奶棚已歸「軍管理」，上海人目前所吃的牛奶還不及重慶人所吃的，牛油根本絕跡於市上），辣醬油等等西餐調味的主要食品都非原有的味道，上海人很聰明，現在

叫做「番菜」，表示與「西餐」有別，換一句話來說，所謂「番菜」就是中國菜，不過份量有了限制而已；而西餐每客的價值是固定的，三十二年八月份是五十元至二百元，三十三年四月是二百元至五百元。

上咖啡館呢！咖啡座的生涯還沒有沒落到銷聲匿跡的境地，西藏路一帶和靜安寺路都有好幾家。現在，我來講給你聽一樁事實。

在沒有實行燈火管制之前，我看完了夜戲，到「皇家咖啡館」去進些食物，那時大概十二時半，而「皇家」的經理是高麗人，「特殊階級」的人種。坐中客滿，喝着談着的時候，突然進來了三個腰備手槍的「友邦人士」，「站起來，排班！」高聲喊着。大家就不得不離了座位而排起班，我還以為這不過是查「市民證」的嚴重形式而已。「你們拿出表來，看一看什麼時候了！」他等了一會，「十二時以後不許吃咖啡的，知道麼？」。到這時候，那韓藉經理過去陪着笑顏，說了許多日本話，結果還是不行。他繼續着他的「訓話」：

「你們這般人，不是囤積居奇的暴發戶，便是靠着父母的遺產的公子哥兒，在這非常時期，還深夜作樂？……」滔滔不絕的痛罵一頓，大家目停口呆的聽候「判決」。

那老闆又苦求了一番，他終於說：「現在姑且饒你們初次，趕快付了賬，回去；下次再遇到我，一定叫你們到警察局去過夜。」

上面的話是一個日本人說的，旁邊有一個中國人翻譯的，足足半小時。舞場呢，過了三十年的耶誕夜之後，就遭遇了厄運，「青少年團」的「除三害」運動就強迫舞場

停業了三四天，「新年」門可羅雀；實行永遠燈火管制以後，舞場的生涯更一落千丈，娛樂捐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因之舞場裏的飲料價格就不得不提高，更使舞客裹足。事實上，到舞場去觀光一番，彷彿就要手提一皮篋的鈔票不可，四五個人的茶帳時常可達二三千元，舞票彷彿以千元為單位（實際上，舞女的收入還遠不如昔，度生活尚感不夠，故服裝日趨寒酸），舞女的「質」又日趨低落，破費既太鉅，而又找不到樂趣。

電影院的門券尚屬低廉，但必需排班購票；而英美影片絕跡後，德法新片亦無法運到，上映的僅限於「中華聯合電影公司」獨家拍攝的片子和日本影片而已。進電影院就必需先檢查一下座下，有無危險物品；而中途出場又在被禁之例。換言之，看電影便是①失去自由，②強迫接受宣傳而已。

平劇院會一度盛極一時，北來名角時常薈集上海；但永遠燈火管制之後，就退化了。「大來國劇公司」虧損達五六百萬元之鉅，以後一定更凋零。

話劇也受燈火管制的影響。有一時期，夜場改在下午四時至八時上演，但也沒有效果。

現在，夜戲大致是六時半開鑼，十一時半以前一律停鑼。這一來，想看戲的人就十分為難，吃了夜飯去，看話劇根本只看一半，看平劇則已有一齣好戲漏看，而來去的車力一定比戲券（最高平劇戲券為一百八十元，話劇為一百元，三十三年四月份）更貴；所以，劇場的生意便打了對折以上。在前年（三十二年），看李少春，就非在前一天買黑市票不可；到了去年（三十三年），當天晚上七時進天蟾舞台，可穩買到上佳的座位，問題端在①你得挨餓，②如何歸家。

虹口

那是敵人的世界，除了一部份劃為猶太區之外。在這一個區域內生活着，你會感到與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完全兩樣。米，煤，油，糖等必需物品決不至於感到缺乏，而且價格低廉（因為配給量與「租界」不同，而且決不拖延）。譬如，上「會食堂」吃客飯，一客「新國民飯」（一盆上佳的白米飯，加些肉和蔬菜）只賣四元；靜安寺底最小的飯店裏一客客飯就要售三十五元（實際上加三成之後實付代價為五十元），而且粗米飯只許兩淺碗，相差幾乎是十倍以上。

旅館的房金也低廉到一與三之比，而且舒適過之。「興亞大廈」裏的雙房間，不但陳設傢具都是簇新的，冬天有水汀，夏天有冷氣，熱水管及電梯整天不停，房金僅九十六元一天，一切包括在內。

你可以在這裏吃到新鮮的牛肉（在「上海」大都是冰藏的），新鮮的啤酒（在上海是有限量的），價廉而物美。（塘山路的「德大」牛肉莊，午餐的時候門庭若市，排班進食，「上海」方面想吃牛肉的人們只得化了加倍的車力過橋去嘗試。）

猶太區頗像桂林，一行列的平屋都是各種各樣的小商店，空地上都是攤頭，鶉衣垢面的猶太童婦們守着，你在這些地方，多費些討價還價的唇舌，可以買到最廉價的日用品。猶太人除了得敵憲兵部的特許之外，平時不許越雷池一步的。

然而虹口區的居民是寥落的，從前多少豪華的北四川路現在冷寂異常，左右兩旁都是敵人的「組合」或「另售商」；國人住在虹口的僅僅是開小烟紙店的，在敵人工廠裏當苦工的或做小職員的，或奴顏婢膝的「順民」而已。

上海內幕

九四

大家明知道虹口是「天堂」，「租界」是「地獄」，但「天就要亮了」，「雞蛋終要下來的」，而「天堂」必是「蛋」的下落點，故遠而避之矣。（他們總究是聰明的，現在已經證實了。）

★

★

★

從到過東京去的人們的口中，日本人過着比重慶更清苦的生活，什麼東西都是嚴格統制的。以偽府的外交官的資格，到了東京之後，三餐也有一定的場所，購買日用品都有限制，而且都需憑「券」方可購到。

上海是一步一步走向這條路了。上海的居民將因敵人的搜括物資而受到乾枯的生活。

銀行已受到「管理」，物資日見缺乏，過慣着奢華和舒適的生活的上海人已無親眼目睹「上海灘果真癱了！」。

九、斷鴻零簡

「臣之所舉，非叨織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汗簡扎哉！」——范滂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形累，不知太初，注以竹簡，相問訊也。」

——莊子

想到就寫，一些另星的報道，也許還是有趣的故事，也許正是讀者們想知道的。

對於偽區中有些事，我不能作有系統的報道和分析，譬如文藝界，我和他們接觸的機會就不够多，我也只得就我所知道的隨便記下，又如體育界，上海的情形未必能概括整個的偽區，所以，只能算作斷朝爛報而已。

★

★

★

藝文壇

朱逆漢，自號「漢園主人」，所主辦的「古今」，顯然是偽區文壇的驕子。「古今」是半月刊，汪逆陳逆時常有「文章」刊載，陳前最有「雅」興，寫些「改組派」時期的黨史，自吹自唱。偽「儲備銀行」每月貼十萬元，內容以掌故，考據及散文爲原則。○整居北平的周作人，筆名還用「知堂」，「和平文選」得獎者的柳雨生，潘予且，「新詩人」譚誰翰等是常川的撰述。

馮和儀，一個女作家，筆名「蘇青」，最近與其夫譙異，主權的「天下」，也是同樣性質的期刊。女作家很多新名字，張愛玲，汪麗玲，關露，魯風，潘柳黛，吳江楓等層出不窮，也是一個怪現象。

陳蝶衣編的「萬象」，吳誠之編的「雜誌」算作綜合性的月刊，其實不過是散文和小說，頭尾有「一月風雨」和「文化報道」而已。

陶亢德去春由日本返滬，逆迹昭彰，據說，想活動辦週刊。江棟良，寶宗淦算是「漫畫家」的翹楚，其實他們也難得作漫畫，不過是「插畫家」而已。

路易士為「中華日報」寫副刊，跟從前一樣的無聊，與小報界一天到晚打筆墨官司。小報界以王雪塵（繁華報）胡力更（力報）為「巨頭」，誨淫誨賭，騙人騙己。

邵洵美依舊是鶴立鷄羣，不為污泥所染，賣家當過日子，閑來以集郵為消遣。

話劇界出了兩顆「慧星」，男的叫石揮，女的叫孫景路，都是萬能角色，吸引力甚大，包銀較其他任何演員高出一倍以上。後起之秀有一個女的叫羅蘭。

這兩位女的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臨場暈倒，據說是演劇過於認真所致。因之，上海會一度盛行A B制，那就是一個角色由兩個演員前後分飾，或今日A飾，明夜B飾。這一種制度後來因為於營業有礙而取消了。

電影界還是這批人物，陳娟娟長大了，躋於「明星」之例。最近趨勢影星有同時上演話劇的舉動，「中聯」並不阻止，其實他們的收入也非有這一種額外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

話劇團以「出碼頭」較有「生路」，因為同時可以做些「單幫」生意故耳。

平劇的藝術日趨低落，主要原因是掛頭牌的年齡太青，換言之，成名太易太早。從前的四大名旦，非到近三十歲不敢掛頭牌，唱壓軸；現在的四小名旦都是毛頭小夥子，人家捧得高，藝術就無從進步。還有一個毛病就是戲路因營業關係而狹窄，類如張君秋只有兩齣戲可以賣座，那是「起解帶堂審」及「全本四郎探母」，三天二頭就只唱這兩齣戲，童芷苓幾乎每天是「大劈棺」和「紡棉花」，於是有一「劈紡旦」的一派。諸如此類，每况必愈下。

還有一點應該一提，在上海，西洋貨的白報紙的存儲量已顯見短少，各大報均縮小篇幅，小型報及定期刊物多已改用「民豐」紙（上海民豐造紙廠出品），較白報紙為粗，而略帶灰色的。印刷技能已較前低落多多，任何讀物上錯字百出，敵人想收宣傳之功也日見黔驢技窮了。

體育界

「社會福利部」有一「體力司」（司長為曹逆邦鄰），而褚逆民誼自任「全國體育會會長」；所以，體育事業是丁逆默邨與褚逆互相爭奪的標的。褚逆在上海的時候少，「社會福利部」有駐滬辦事處；於是，上海的體育界是丁逆所控制的。丁逆則利用沈逆嗣良，沈逆就榮任「上海特別市體育會會長」兼「上海足球聯合會理事長」兩職。

「體育會」和「足球聯合會」的總幹事是周家騏，沈回春副之。整個的體育界是鈔票的世界。主持者和提倡者的目標是燃鈔票，如沈逆等之把持足球聯合會就從事於將贈券賣黑市票（上海一場足球比賽，觀眾達一二萬，門券分二十元四十元兩種，逸園或膠州公園門口都有黑市門券，每賽收入鉅萬，沈逆等的收入亦頗可觀），各報的體育記者則勒索宣傳費（無論何種公開賽或義賽，記者必需於收到津貼後，方刊載比賽消息，「新聞報」之裴順元幾乎規定每賽千元的「

潤格」)等等。運動員則以體育謀生，如邵逆式軍主持之「聯誼足球會」更爲顯著(見第六章)，華聯藥廠及「儲備銀行」副理汪逆仲陶(汪逆之姪)所主持之「華聯」及「中北」籃球隊等均是一丘之貉。錦標可以內定，裁判可以賄賂(華聯之得西僑青年會三十二年度邀請賽冠軍，即藉賄賂裁判劉荷生鄭志芳等，甚至賄賂對方球隊之健將的結果)。所謂「慈善比賽」，目的都是創辦者要錢化，而方式則是慈善機關獲得一小部份(大致是義球的拍賣金額)，主持者與球員分拆門券收入。華北急賑籃球賽，門券及捐款總數達四十萬元，華北急賑會分文未收到。市長盃足球義賽因分贓不勻，幾至涉訟。這些都是公開的祕密，路人皆知者也。

「上海體育會」(就是跑馬廳)及西僑青年會則是敵人的勢力範圍。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上海公開足球賽，「東華會」得冠軍，十戰十勝；此賽共有七隊參加，「聯誼」中途退出(因敗於東華)，「僑聯」「三省」兩隊都是潘逆三省所主持的，「葡商」「猶太」可依名思義，「一警」等於從前的「西警隊」，「第一區警察局」所組織者也。

袁履登，林康侯，聞蘭亭三「老」可憐得很，不論是結婚(做證婚人)，開幕(剪綵)，義賽(捧着球當衆拍賣)都在必到之列，報章上稱之爲「藥中三味」(甘艸，陳皮，茯苓，任何藥方裏都有份的)，慨乎言之矣。

聞人之流

賭場老闆如夏士魁，黃永康，葉春華之流亦屬「聞人」之一種，凡是拍賣義球，獎學金等捐款，只要「社會福利部」或「市政府」一角公函，都必自認鉅款，不敢稍示吝色的。

潘逆三省當然也是聞人，曾被李逆士羣「誣古」而被禁於虹口者一個月，與其「妾」王潔女士打雜齋官司，甚至於被控「和奸罪」(與一舞女名「黃三妹」者)，同時又熱心於提倡體育，「三省體育會

「下有兩個甲組足球隊，女子籃球隊，甚至於網球隊，田徑隊都有，他的大名時常見於報章。有一次，他對我說：「我是一個不歡喜有家的，你看，這裏（巨瀨來斯路二〇一號的大廈，一紗布統制」後向「儲備銀行」抵押二千五百萬元）只有我一個主人，茶房廚房等倒有二十個模樣，每天有朋友來敍敍就够有趣味了。那般義大利人也怪可憐的，我就請他們住在此地。我之提倡體育，辦球隊，間接就爲了公共事業，我所化的錢有限，每一場賽的收入就可做較大的善舉。現在這時候，只爲個人，太笨了。」他的話是真誠的，義陸軍足球隊興放後就收留在他家裏。

陳逆彬也是聞人，除了控制「申報」及「新聞報」外，一天到夜，參加公衆集會，他有一天對我說：「我每天起身得很早，上午八時至九時，在家中見客，晚上十一時以後才到申報館，其餘的時間我自己也不知是忙些什麼。保人出獄，哈特高科憲兵司令部捉去的，我每天總去保一二個出來，什麼重慶份子！到了上海就不是重慶份子。現在我忙些死難的警察的撫恤金問題，跟市府交涉了好幾次……」他他的確變成了一個怪人，他住在「法租界」的十八層樓大廈的第九層，九〇一號室，滿堆着古書的書房裏進進出出都是奇奇怪怪的人物，日人，俄人，葡人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澈大使館給他「特權」，每天收聽我們中央社的電訊，而且胆大地時常向人家公開報道。

我認爲：這一般人都是「自認罪大惡極，所以廣積善德，下意識地求良知良心的安慰」而已。

下面都是我親自聽到的句子：

違心之談

王正林（我世瀛隊馬拉松長程跑選手，現在丁逆默郵手下做一個小嘍囉，「社會福利部」的科員）有一天夜裏，到我的房裏，說：「說起來，真是笑話，那時候誰也

不知道什麼叫和平運動，那不是蔣兆祥麼，他來叫我去，我也不知道，叫我到七十六號裏去了一次，說起來，這完全是騙子一樣的，我以為他是老朋友，他担保沒有事的，去了果然沒有什麼事，填了些姓名在一張印好的單子上，第二天，兆祥就叫我陪他到永安公司去，三層樓的鞋子部角上，他叫我立在外邊，他就這樣的偷偷的丟了幾張傳單，他說成功了，再第二天他就領了錢來，分給我些……」他據實講出當初的所謂「冒險的和運史話」。蔣逆兆祥是「招撫」體育界的主角，他曾被我方特工人員擊中了一槍，到南京去匿蹤了一二年，最近在上海又出現過，後來據說因假冒「長官」案被判徒刑了。

滕逆樹毅（前時報的記者，筆名，「老滕」，現在偽京，任「正報」編輯）到上海來的一個夜裏，與我握手言歡後，高聲談着：「老陳，我們快有十年不見了：我還是這樣，下筆不罵人總不過癮。現在這批人個個都該罵，罵了他們也沒有什麼。我之參加和運，也不過應應時，況且不參加和運就沒有飯喫，參加了和運也照樣可以罵和運，那又什麼關係。我們是老朋友，談談不要緊。」他還是那樣的神經質的人，到上海不到一星期，在張逆葆奎（「國光通訊社」社長）家裏賭錢，輸了二三萬元，一溜烟到南京去了，彷彿早不認帳。

白雲（上海電影界中小生的後起之秀，同時是「哈同夫人」的入贅女婿）曉得我由內地來，特地來看我一次，說：「關在上海，好像鳥入籠中，一些生氣也沒有，像你那樣，倒處旅行，一定別有樂趣，我非常佩服。譬如，像我那樣到重慶去，可有生活的辦法，做生意我不會，單單靠做話劇，能過活麼？稍爲苦一些，我倒不怕；路上苦，我也不怕。我只愁，沒有錢的時候將怎末辦！」

徐逆世光說：「你不要再叫我體育叛徒了，是的，我是體育界中第一個活動的，聯誼會沒有我，那

裏來的球員，這班人都是我請來的；楊秀瓊也是我最先打電報去的，但是我現在對於上海的體育竟無插足之地。丁默邨一味地捧沈嗣良，也好。這次派人到日本去，本來內定有沈嗣良，他倒不肯去；我是去的，現在日本要舉行大東西球類運動大會，我去接洽，看他們參加不參加。丁默邨沒有出息，我也不必再跟他，我會得說日本話，終有辦法。」

在滬區內的人們就是這樣的傾軋，自顧自，和內心矛盾的。

這一個小標題一定會使讀者想起盛傳一時的「電影院中的故事」，不過據我所聽到的關於這一個「故事」，傳說不一。那故事簡單地說來，便是：

銀幕上映出先總理遺像，林主席遺像及總裁玉影時，觀眾鼓掌歡呼，最後映出汪逆的小影時，觀眾嗤之以鼻，電燈突然亮了，敵憲兵出現於台上及電影院的門口，向觀眾質問，何以對汪逆表示不歡迎的態度，如無合理的答詞，將觀眾全體拘禁於「捕房」，結果則有一大學生起立，作聰穎而合理之答詞，大意謂：當林主席為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米每石僅十元左右，現在米每石上千元了，我們所歡迎的只要食米的價格再回跌到從前的價格云云。

這一種故事，我不敢說是捏造的；但有的說那映出來的影片中沒有總裁的，有的說那致答詞的是一個小學生，好在這一種故事的產生是在我未到上海之前，我所以不能負責證明其可靠性；然而敵人的個性是會做出這一種惡作劇式的「測驗民心」的舉動的。

三十二年九月九日的清晨，上海的居民有些聽見了槍聲，下午才明白義大利國反正了，義陸軍都繳械了，入集中營了。……商店都被封閉了，而最惹人注意的是義郵輪康德梵地號在黃浦江中沉沒了。敵

凡的情報機能顯示了脆弱，這一艘郵船是美國在上海最有軍事價值的財產，却被義軍自動沉沒，而敵人竟未能在事前阻止。龐大的郵船橫臥在愛多亞路的外灘前面，據說日本的工程師想盡方法，到現在，還無法打撈，其中有一個竟因之切腹自殺。外灘的「和平神」及五馬路到愛多亞路的一大堆房子（砌了「起重機」，用粗而大的鐵鍊，一面繫在船上，一面圍着房子，交通因之斷絕（水陸交通俱遭阻礙），鐵鍊倒斷了好幾次，康德梵地還是橫臥着。這一件事，敵人認為奇恥大辱，歐洲方面的情報司長因之增職，技巧工人殞命十餘人，但無可奈何。（最近敵人又將該法撈起之前，却被盟機整個炸毀了，可憐的敵人！）

義大利人關了兩個月却又放了，據說，只要他們對墨索里尼宣誓守信，便可釋放；然而上海平白地多了一批洋裝乞丐而已。

在三十二年「九一八」左右，某一個下午，西區突然緊急戒嚴了，形勢十分嚴重，敵憲兵及海軍陸戰隊大批出動，足足四小時之後，才解除封鎖。後來，據調查所得，是這樣一回事：

愛文路路上，一個小孩子正在馬路上走的時候，突然被風追電馳的機器腳踏車所撞倒而失去了脆弱的生命，一個警察看見就命令那輛機器腳踏車停止，那車上是兩個敵憲兵，置之不理，那警察就拔出手槍來，兩槍將兩憲兵槍決，第三槍打自己的太陽穴而殞命。事初，敵人認為「暴動」，後來澈底調查後，這事完全是那警察個人的愛國心激動，也沒有法子了。

第二天報上竟登載：警察撞死小孩的新聞。

在三十三年的新年裏，總裁告全國國民書的摘要，相當的普及於上海的市民心裏，敵人竟大興文

字獄，四個中學七個小學的教職員，計百餘人，均被捕入獄。我所知道的有錢旭滄君，但幽禁了一個多月後，查不出證據，也只得逐漸釋放了。



新報

上海內幕

1933

後跋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而中慙；撫已何堪，颯額無措！」

——林希·謝校勘啓

在歸途中，我就有決心想寫些東西，於是，凡專門名詞，或是小標題，札記下來，胡亂地札記下來，千頭萬緒的，在永嘉逗留七天，寫了二三萬字，到龍泉一居三週，完成了初稿，如此的蕪雜無章，既非「論」，又非「記」，忽而像「社評」，忽而像「小說」，好在尙「脫」記者「本份」，就斗膽的付梓了。

起初，我擬定書名「在上海一年」；後來，覺得：「上海內幕」比較的時髦些，捫心自問，對於一個淪陷後的上海尙揭發了內幕的種種，所以改名了。

一口氣寫一本書，在我還是「處女作」，寫完了以後自己看看，似乎不甚像一本書；但也不想用別的方法來發表這些——我以為還值得供諸大眾的——在報章發表，嫌太冗長；事實上，報章雜誌上已發表了三分之一，也是敦促我付梓的動機。

也是在歸途中，我所接觸的事物中似乎也有些以一吐爲快；既非「上海」又非「日本」，所以我借這「跋」的地位寫了下來：

從上海到甯波，現在仍有海船，海上行駛的用發動機的輪船；這是淪陷區內僅存的兩條航線之一（另一條航線是上海至舟山）。上海到漢口的長江航線自去年年底就不公開售船票了，無形中停頓了；上海到廣州，上海到青島也是同樣的命運。據敵人口中傳來的消息，上海到華南方面去的航輪，現在已採用護航辦法，每六艘船為一組，由兩艘驅逐艦左右保護，上面則是三架飛機，航線改成三角型，由上海先到台灣，再由台灣駛經華南各埠，飛機則由台灣方面敵根據地起來相接銜。船隻的缺乏的確是敵人朝夕不安的致命傷。

在戰前，滬甯航線的船上相當舒適的，船上的飯菜尤為可口；去年，我從甯波到上海的時候，覺得已遠不如昔了，此番從上海到甯波，我所目睹的簡直是一幅難民圖了。

在中法藥房的三樓上，「東亞航運公司」的門口，老早就緊密地排列着人羣；擠着想買的還是五天後才啓航的船票。

日本領事館之東，外白渡橋下塊，「新甯紹輪」停泊着的地方，人像螞蟻似的擠着，行李堆着，提着藤條同人叢中亂抽的敵人……從一時半就到了碼頭，三時半才上船，我只隨身攜了一隻手提箱，尙且如此，肩上還吃着一籐條，那還是那執藤條者看我衣服穿得整齊些而客氣一些呢！

化了二百元買到一張四等艙的黑市票（原值四十五元）！上船後改換一張三等艙票，又化了三百元（三等艙原值七十五元，黑市難得有買，故非經此兩層竹槓不可），借一條棉被，需四十元（從前是免費的），茶房小賬強派每人六十元（其實毫無供應，連茶水都得自己去設法）。吃晚飯的時候到了，一到飯廳一看，圓桌上坐着十個人，桌上是三隻碟子（裏面是：鹽菜一碟，海蜇一碟，豆芽一碟）和一

碗醬油湯，飯是粗而黑。可是每一個人吃下去的，而且有人吃四碗之多。

我在上海過的總算是舒適的日子，於是，我體驗到淪陷區一般人民的景況了。

鎮海離甯波四十里，居甬江之入口處，等於吳淞之對上海。鎮海屬於「海軍管轄區」，甯波則有敵陸軍部隊，偽第十師，偽中央稅警團等駐紮。距鎮海縣城西郊三里的張鑑壩（一個小村鎮）就有「新四軍浙東三五支隊」的集會，離甯波江北岸（敵軍駐紮處）二十里的莊市鎮也有「三五支隊」的總部。敵人偽軍都置若罔聞。在這樣短狹的距離內，敵人所能「保守的」只不過是兩個縣城（點）和一條用小汽輪通航的甬江（線）。這是一點，值得一提的。

甯波的鄉下（其實郊外便是如此），農人就遭敵偽的不斷徵收搜括，「三五支隊」的擾亂，有時還得對游擊隊伍予以供應；三種「力量」的脅迫奴役下，老百姓的痛苦我們應該想像得到。

浙東，蘇北，皖南一帶，「三五支隊」的潛勢力是够膨脹；他們施着惡毒的「策略」愚弄鄉民。他們總先煽動一個鄉村裏的流氓痞棍，甚至暗中供給槍枝，而當這班流氓痞棍無法無天明搶暗綁的時候，便整隊開入，先槍決那些該死的流氓痞棍，以博鄉民的歡心，繼之便徵收糧食和供應了。平時，他們很能做到假仁假義的紀律，所以，鄉民對於他們還取着庇護的存心，敵偽軍想剿滅他們，總是漏網的，因為鄉民便是他們的耳目。

這一點，我也不得不一提。

我記得：在去年（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在甯海城外三十里的橋頭胡，我將法幣去換偽幣，那時是一百元法幣只換得七十元或六十八元偽幣；五月一日（三十三年）我在奉化的白杜鎮上，將偽幣換

法幣，兌換率則是偽幣一百元換得法幣八十八元。

我欣然的，不到十一個月，我們的法幣已經戰敗了偽幣。本書付梓時偽幣已貶值至法幣四角。

「不會沒有陰天，不會不下雨，但是，天永遠是藍色的。也有黑暗的時候，也許有痛苦的時候，但是，只要埋頭努力，光明總是我們的。」我再給讀者驚奇一下，上面的文字也是周運幼海的「日本概觀」中的最後兩行。



上海內幕



10A

中華民國玖壹年 壹月 廿三日 購買

敵國醜相

這是一本奇書，揭露戰時
 東京的苦悶真相，日本概
 觀，去年二月八日，由上海
 一新生社出版，未經檢査
 印。作者周逆幼海，是周
 的兒子。去年僅廿三歲，可
 此書是「老奸巨滑」之
 兩人均遭敵人手軟禁，一
 敵對該書之出版固深惡痛
 恨之也。對於敵國種
 種，以轉灣抹角的
 幽默，警惕之，諷刺
 調侃，曲折，落落筆高
 行文，讀來如冬夜嚼
 永，輕，不，忍，釋，手
 也。

五十一
 定價每册

周逆幼海原供
 桑榷批判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初版

上海內幕

全一册 實價國幣

著者 桑榷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南平明遠路

印刷者 東南日報社

經售者 國民出版社

南平中正路

國家圖書館



002527947



27

籍

637